

果戈理

果戈理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是世界著名的讽刺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长篇史诗《死魂灵》等。他以自己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封建农奴专制的种种罪恶，并诗意盎然地歌颂了祖国的光辉未来和人民的无穷力量。他的创作，不仅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而且对俄国人民自由思想的觉醒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果戈理就被誉为“自然派”的创始者和杰出的讽刺艺术大师。

果戈理是一位具有深远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欧美各国几乎都翻译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也深受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与喜爱，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人把他的作品译成了中文。

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与果戈理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青年时代的鲁迅最爱读果戈理的作品。他不仅为翻译、评介果戈理的作品，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学习和发展了果戈理的讽刺艺术，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坚贞战士。

现在，果戈理的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中文，有的还有几个版本，变成了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生活道路

充满幻想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果戈理于一八一九年四月一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大索罗床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祖父在基辅神学院毕业后，曾到军队里服役，后来同一个家业殷实的地主的女儿结了婚，得到一处田庄，成了小地主。当果戈理的父亲出世时，这座田庄才改名为华西里耶夫卡村。

他的父亲华西里·亚芳纳西耶维奇·果戈理，受过正统中学教育，服过军役，后来又供职政界。此人博学多才，爱好戏剧和文学，是一个在邻近有点名气的喜剧作家。辞官后，就在他的祖传田庄华西里耶夫卡村定居下来。他们一家在这里过着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恬静的生活。

果戈理的母亲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出身于官吏兼贵族的家庭，但她是一个缺乏教养、不切实际、轻信而虔敬的妇人。她热爱长子果戈理，几乎常年住在华西里耶夫卡村，教育自己的子女和料理家务。她受宗教影响很深，经常给果戈理讲地狱的恐怖景象和因果报应的吓人故事，给果戈理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恐惧的因素。她同果戈理的父亲关系很好，相亲相爱，一直过着柔情蜜意的生活。

果戈理的童年，是在偏僻的外省和丰衣足食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他家的住宅虽说不上富丽堂皇，可还舒适宽敞，四周是幽美如画的花园与水池；家中还有众多的仆从，丰盛的午餐和体面的车马……

果戈理的祖母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每到那寂寞而漫长的冬夜，她就给果戈理讲一些古时查波罗什哥萨克的动人事迹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她还接二连三地唱一些古老的歌曲给果戈理听。夏天，父亲常常带他到广阔的草原上去旅行，欣赏那里的瑰丽景色，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果戈理则经常是留连忘返。

附近一个豪富的大臣特罗欣斯基是他的亲戚，果戈理一家经常到他的田庄里去做客。年纪小小的果戈理，非常喜欢特罗欣斯基家和其巨大的藏书室、画廊和各式各样的艺术珍品。他常常一个人躲进他们的藏书室，专心致志地阅读大量的稀奇古怪的故事书，浏览、鉴赏画廊与珍品；他也往往被特罗欣斯基家的私人乐队和戏剧演出所吸引。他的父母也经常扮演角色，登台表演。观看父母演戏，这是小果戈理当时最感兴趣的事情，并大大地激起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为他以后从事戏剧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萧条的索罗床采镇上每逢集市，就变得格外热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每逢这时，受好奇心驱使的果戈理，到处都想看看听听，有时甚至忘记了饥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观察生活细致入微的良好习惯。家乡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往往给他一种美丽入迷的感受；而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传说，却给他那幼小的心灵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他的思想随之进入了一个瑰丽、烂漫的幻想天地。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打下了良好的生活基础。

一八一八年八月，果戈理与弟弟伊凡到波尔塔瓦去读书，进了当地的县立小学。第二年，他的弟弟病死了，果戈理也患了一场大病。这两件事，对果戈理忧郁、孤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病愈后，心情感到孤独的果戈理回家关门自修。后来，在亲戚特罗欣斯基的帮助下，果戈理进了涅仁

的“高级科学中学”。涅仁“高级科学中学”的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有钱有势的名门权贵的子弟；一派是破落地主阶级的子弟，果戈理属于后一派。他与纨绔子弟接触很少，但却经常参加附近村子里的迎娶喜事。一些富贵子弟常常讥笑他缺乏教养，举止粗俗；同时又因他生得一副怪相，而经常以此奚落他。果戈理对他们也毫不示弱，他常常用漫画、打油诗进行回击。一八二五年，果戈理的父亲病逝。因失去了惟一的依靠，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但与此同时，果戈理又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人，善于出主意想办法。他的倡议一经提出，马上就会得到小伙伴们们的赞同。他还在同学们自己组织的戏剧团体里当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设计师，显露出了超凡的艺术才能。他的表演往往能博得大家的欣赏和赞誉。

当时，正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秘密团体开展活动，自由思想广泛传播的年代。涅仁虽然是一个外省的小城，离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心很远，但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了这一僻静的乡村，涅仁“高级科学中学”的学生们，纷纷背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歌颂自由的诗篇，阅读《北极星》杂志上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热切地关注国内的政治事件。在涅仁中学的教师中，也有些进步思想的传播者。这些人，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曾遭到沙皇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一八二七年，曾发生过控告法学教师别洛乌索夫的“案件”；当局指控他发表政治方面的犯罪议论，教课常常带政治色彩，进行政治攻击。果戈理也卷进了这个“案件”之中，受到审讯，因为他深切同情别洛乌索夫，所以提出了有利于别洛乌索夫的见证。从这里可看出果戈理当时的政治倾向。中学时代的政治斗争，对果戈理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在涅仁中学时期，果戈理还表现了对文学艺术的特殊爱好，对农民生活的极大关怀，对社会“俗物”的十分鄙视，对造福人类的热烈渴望。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长诗《汉斯·古谢加顿》（1827）中得到了反映。

在中学期间，果戈理的成绩很好，但在学习上，发展得不怎么平衡。他自负而矜持，不愿和同学们接近，显得清高傲世，被人当作谁也猜不透的谜。他的内心有一种秘密的思想与信念，他将成为著名的人物，“广阔的活动范围”在前面等待着他。然而，生活在一些“俗物”当中，生活像死一样地沉寂，他的内心又感到无比的痛苦与恐惧，为了揭示自己灵魂的奥秘，他在中学毕业前不久写信给母亲说：“我体验到的悲伤与苦楚比您想象的更多……恐怕谁也没有像我这样经常容忍别人的忘恩负义和不公平的态度、愚蠢可笑的要求、冷酷的蔑视……您把我叫做梦想家……不，我对人了解得太深，我不可能成为梦想家。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少年时代的果戈理充满着幻想，有时成天想入非非，脱离现实世界。他想写诗，同时他又醉心于戏剧，是一个很出色的喜剧演员，有着“伟大的演剧才能”。因此，他的同学们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甚至他自己也认为将成为一个好的，至少也是一个不坏的演员。然而，当时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他的面前有一个重要而高尚的、于祖国有利、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工作，但不是文学，也不是演戏，而是幻想入司法界，想做社会最公平的裁判者，施惠于人民大众，给人民减轻和消除痛苦。离开中学时，他对未来的生活满怀信心，准备进入社会，献身于未来的事业和理想，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困境中走上创作生涯

一八二八年，果戈理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毕业后，怀着一种“于祖国有利，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崇高理想到了彼得堡。但沙俄时代的首都却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位热血沸腾的外省青年。他到处碰壁，郁愤满腔。失业造成的贫困，给他以严重威胁；社会风尚的腐败，使他感到失望和压抑。他的幻想破灭了，直到一八二九年底，靠一个亲戚帮忙，才在国家经济与公众建筑局找到一个薪金低微的小职员职务。一八二九年，在母亲的资助下，他出过一次国。在这年的夏天，果戈理便想到了一件巨大的工作——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八三〇年二三月间，他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巴沙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一八三〇年四月，他转到封地局担任文牍。文牍生活单调而又枯燥，每天上午九点赶到机关去上班，伏案抄写公文，抄到下班时，早已头晕目眩，疲惫不堪了。如果在抄写中有一点差错，就要遭到上级的严厉呵斥。他的薪俸很低，一年只有六百卢布收入，但彼得堡当时的生活水平，一年要有一千五六百卢布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为了生存下去，他只好靠家里的资助。在这些岁月里，果戈理深切地体验到了官场的腐化堕落、小公务员所遭受的贫困与歧视。这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短篇小说《外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八三〇年是果戈理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他认识了俄国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和批评家兼出版家普列特尼约夫。经普列特尼约夫介绍，他开始担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并于一八三一年初在一所专为“名门淑女”设立的中学讲授历史，并有幸认识了普希金。从此，他与普希金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普希金对这位青年作家非常关心，给他以良好的影响，鼓励他大胆地进行创作。这时，果戈理抛弃了封地局那个“愚蠢的”、“无意思的”、“猥琐的”差事，一边教书，一边躲在幽静的房子里进行着一件将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的工作——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卷。接着于一八三二年又写成了该书的第二卷。果戈理认为，从事文学创作，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请看在上帝的面面上，尽情地为我高兴吧：这是医治一切病痛的惟一的和最有效的良药……工作，自然只是那安静的、有益的、不受烦扰、不慌不忙和从容的工作，它永远有一个不可分离的旅伴——快乐……”但与此同时，他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腐化奢侈生活也感到痛苦，并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的地主多半染上了东方式的奢侈：拥有大批仆役、喜欢购买那些完完全全可以用家制品来代替的东西；他们……不会整理自己的庭院和住宅，不会量入为出，而当他们的计划与新的事业遭到失败时，他们还表示惊异……”“我非常想知道我们同乡的情况，他们的田庄的不断破产使我感触甚多；闲暇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些可能想到的办法，希望引他们走上正路，如果有一天我能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了。”这种想法是他后来创作讽刺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六月间，他回到故乡华西里耶夫卡村，路过莫斯科时，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有作家、教授、演员等等——他终生都同这些人保持着牢固的友情。直到晚秋，他才陪着两个打算进中学的妹妹回到彼得堡来。

从农村回来，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强烈的爱好，这种爱好曾经长期地支配着他，甚至超过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打算写一本《世界史和世界地理》。

同时，他又被写喜剧《三等符拉季米尔勋章》的计划所吸引，并已经进行了精心的创作构思。可是因为害怕审查机关通不过而突然中止了创作。

一八三四年七月，果戈理受聘为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于是，他紧张地备课，拟草案、大纲和教学计划，从九月份起开始讲授中世纪史。开头几次，他教得十分起劲，学生们被他那新颖的观点、广阔的范围以及富有诗意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但由于他的历史观与大学当局的见解不合，而使他对工作失去了信心与兴趣，终于辞去了教职。

此后，他几乎完全献身于文学工作了。一八三五年出版了他的《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这两个集子的出版，给果戈理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受到了别林斯基的热情赞扬。

果戈理认为，出版了两个集子，可以解决他的经济困难，生活从此会过得宽裕一些了。但是，书店老板只给他低微的稿酬，他的生活仍然困苦不堪。他不得不向好友普希金借钱过活。普希金这时不仅给果戈理以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而且还给以创作上的帮助，慷慨无私地将《死魂灵》的题材

给了果戈理。普希金认为，这类题材让果戈理写更为合适。但这时果戈理很想写一部讽刺喜剧，狠狠地讽刺一下贵族、地主以及贪官污吏。因此，十月十七日，果戈理写信给普希金说：“……请给我一个随便什么样的题材吧，不管是可笑的还是不可笑的，但要纯粹的俄罗斯式的奇闻。现在我非常想写喜剧，如果不写的话，那我就虚度光阴，而且还难以预料，我将如何来应付我的处境。我现在除了大学里微薄的六百卢布薪俸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给我一个题材吧，我可以立即写出一个五幕剧来，我可以发誓，将会使人笑痛肚皮。”

当时，《祖国纪事》的发行人斯维恩英是个吹牛撒谎的家伙。有一次，他冒充彼得堡的要人去比萨拉比亚，那里的老百姓纷纷向他呈递状纸，控告当地县长。普希金接到果戈理的信后，便把这个题材让给了果戈理，并建议他将这伴奇闻进行虚构：把斯维恩英改名为克里斯宾，他去集市，人们都误把他当作钦差大臣，他在那里大大地捉弄了当地的省长一番，并向省长太太调情，向省长女儿求婚。普希金还将自己去乌拉尔搜集有关布加乔夫暴动的历史材料，住在省长布士尔杜家里，受到了省长的殷勤款待，并把他当作沙皇派出的微服私访民情的要人，还说他搜集材料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了果戈理。果戈理正是在这个荒诞离奇趣闻的基础上，花了两个月时间，顺利地完成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初稿。后来，作者对它进行了反复修改。《钦差大臣》首次上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果戈理的名望。他感到了做一个喜剧作家的伟大意义和真正的乐趣。他十分感激普希金。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真诚无私，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漂泊流荡的国外生活

在《钦差大臣》中，由于果戈理对沙俄官僚专制的腐败现象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尽情的嘲笑。因此，他很难在尼古拉时代的俄罗斯生活下去，不得不于一八三六年六月到国外去“排遣烦恼”，从事长篇史诗——《死魂灵》的创作。他先到罗马，随后到了德国、瑞士、巴黎。一八三七年三月间，他又折回到罗马，并以此作为常住之地。

一八三七年，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使果戈理悲痛欲绝。他对逝世者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认为他由此所受到的损失比任何人都要大。

在罗马时，他专心致志地写作《死魂灵》。在创作《死魂灵》时，尽管他的艺术构思和写作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高，尽管他在文坛上已经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但他还是那么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他说，他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能工作，任何力量也不能强迫他写作，更不能强迫他交出自己已经看出弱点和不成熟的东西，甚至他宁愿饿死，也决不交出草率的、尚未成熟的作品。他的作品中的每个句子都是呕心沥血得来的。每当写完一部书稿后，他总是要读给别人听，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数易其稿。遣词造句他力求精练准确、音韵和谐，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词，他也要跑到书架旁翻阅辞典，直到弄妥为止。果戈理在创作时，历来一丝不苟。朋友安宁柯夫帮他抄写原稿，他约定工作时不准闲聊。在抄写时，安宁柯夫往往因那些滑稽可笑的情节而发笑，但果戈理却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建议朋友要努力忍住笑声。对于自己写得成功的地方，果戈理往往显得洋洋得意，甚至忘乎所以。他写完《死魂灵》中的“戈贝金大尉故事”之后，问抄写员对该作品中描写泼留希金花园那一章的看法如何，当安宁柯夫告诉他是“天才的作品”时，果戈理把口授的笔记本握成一个卷筒，用轻得刚好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请你相信，别的部分也不比它差。”接着，他又提议在吃饭之前去看萨留斯蒂花园。果戈理非常快活，在路上唱起了小俄罗斯的游乐歌曲，后来干脆跳起舞来，一面把阳布伞在空中挥舞出许多花样，以至没有两分钟，手里只剩下伞柄，其余的部分都像蝴蝶一样，飞到别处去了。可是，他仍然迅速地拣着未飞走的部分，继续唱着歌向前走。此刻，他的心情是多么地兴奋与激动就可想而知了。

过了三年的国外生活之后，他一回到莫斯科，就为家务与金钱而四处奔走。除此以外，他还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向朋友们朗诵《死魂灵》的开头六章。九月间，他再次去罗马，专心于《死魂灵》第一部的最后润饰工作，并构思这本巨著的续篇。

《死魂灵》第一部是一八四一年于意大利完成的。第二年，果戈理把手稿带回俄国，准备正式出版，因受到种种阻挠，拖至一八四二年五月，才正式问世。从此，他作为伟大的暴露者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挺立于俄罗斯文坛。一八四二年六月，果戈理为了治病，再度出国，为期长达六年之久。他经常往来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过着漂泊流荡的生活。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国内的先进人士，还常常处于反动文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再加上他原来就深受封建宗教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批判封建农奴制转为歌颂它、保卫它，并热衷于从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中去寻找出路。他思想上的危机，导致了创作上的剧变，终于发生了焚烧《死魂灵》第二部和出版《与友人书简选》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一八四二年尚在出国途中，他就开始考虑在《死魂灵》的第二三部中创造一些善良的正面形象，以供人们模仿和学习。但使他感到极大的困难的是，缺乏第一手材料——真实的生活基础。要写，只能凭空虚构，靠主观臆想。一八四五年，果戈理患病，在德国的霍堡地区疗养。他怀着矛盾与痛苦的心情，终于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初稿。当他拿起初稿来审阅时，发现稿子中漆黑一团的现实生活和从那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中流露出来的批判讽刺的逼人光芒时，他大为不满。几经修改，他又觉得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已变得苍白无力。左思右想，矛盾重重，几天之后，便把《死魂灵》第二部的修改稿付之一炬了，并且失声痛哭，苦恼不堪。这种痛苦是作者的封建主义的政治立场与不愿放弃现实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虽然，他在作品中反映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可怕的真实，但自己却害怕这种真实。在脱离生活而形成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他背叛了自己的天才，削弱了创作想象的翱翔，把创作想象引到错误的、根本与他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了。焚烧《死魂灵》第二部的初稿后，果戈理整理与友人的通信，于一八四七年初出版了《与友人书简选》。他的思想危机和反动观点在《与友人书简选》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反动文人为之喝彩，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为之痛心与愤慨。别林斯基在病中撰写了《致果戈理的信》，对他的反动思想加以愤怒的驳斥和毁灭性的批评。为了替自己申辩，果戈理写了《作者自白》，但与此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认为他的职责应当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而不应当是凭空说教，并决心回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上来。

俄罗斯文坛巨星的陨落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作了一次巴勒斯坦主行以后，回到了俄罗斯。他先到彼得堡，很快又迁居莫斯科，最初住在波果津家，后来住在尼基丁街亚·波·托尔斯泰家。定居下来后，他又开始慢慢地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了。他顽强不息地写着，但第二部进展却很缓慢。由于主观思想与实际写出来的东西永远也统一不起来，反复修改也没有任何效果。他感到自己的创作力枯竭了。那些作为果戈理既定的可供人们学习的楷模的形象始终树立不起来，好像幽灵一般，若隐若现，捉摸不定。在他的新作中，乞乞科夫、泼留希金们变成了高尚的人物，而实际生活中的乞乞科夫和泼留希金们则变本加厉地掠夺俄国，更加无耻、阴险和残忍了。他自己深深地感觉到，他的作品并非来自生活，而是主观臆想的结果。但果戈理历来就反对主观臆测。因此，他的内心矛盾日益加剧，他时时受到艺术家良心的谴责和鞭苔，精神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之中。这时，经济情况很坏的果戈理，身体健康状况也一天天恶化了。一八五一年夏天，果戈理的旧病复发，精神显著地衰弱下去，他预感到死神在等待着他。同时，果戈理又生活在一批极端反动文人的包围之中。一八五二年初，狂热的马特伟·康斯坦京诺夫斯基牧师来到亚·波·托尔斯泰家，要挟寄居在托尔斯泰家的果戈理遵守宗教仪式，背弃艺术，并对他加以恫吓。患病沉重的果戈理力量耗尽，无法抗拒他的影响。极端反动分子的恫吓促成并加剧了果戈理的精神危机，加速了他的悲剧的到来。于是，果戈理终于在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一日夜将第二部残稿化为灰烬。焚稿十天后，他便在极度的忧伤和病痛之中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俄国文坛上陨落了一颗巨星。

听到果戈理逝世的消息之后，屠格涅夫写道：“一个极大的不幸深深地震动了我们：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了……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心不在这个时刻感到悲伤。对于我们，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向我们暴露了我们自己……只有俄罗斯人才能了解我们失去了怎样一个人物……”

果戈理的逝世，给俄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他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一直在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服务。

中短篇小说

《狄康卡近乡夜话》

自一八三 年在《祖国纪事》二、三月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圣约翰节前夜》之后，果戈理在俄国文坛便崭露头角了。当时作家才二十一岁。一八三一年出版了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次年出版了第二部。这两部小说集的出版，为果戈理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俄国先进文学界正在热烈地探讨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问题；大家对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狄康卡近乡夜话》的问世，像一股清澈的泉水流入文坛，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乌克兰人民生活的新世界，加强了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倾向。

《狄康卡近乡夜话》共收集了八篇小说。除“序言”外，第一部包括《索罗庆采市集》、《圣约翰节前夜》、《五月之夜》、《失落的国书》；第二部包括《圣诞节前夜》、《可怕的复仇》、《伊凡·费多罗维奇·希帮卡和他的姨妈》、《魔地》。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小俄罗斯民间传说，是假托养蜂老人鲁得·潘柯讲述出来的。作品中充满着说神道怪的奇异成份和乌克兰乡村风土人情的迷人色调。除《伊凡·费多诺维奇·希帮卡和他的姨妈》外，都属于浪漫主义作品，它们常常是以风景衬托故事，而故事本身则扑朔迷离，引人入胜。这类作品的基调是明快的，但明快中又含有淡淡的愁情与忧虑；它们以轻松幽默的色彩见长，但在轻松的描述中已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幽默的笔头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犀利无比的揭露批判力量。——这一切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果戈理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独特风格。

收入《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第一篇小说《索罗庆采市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果戈理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主要特点。全篇共分十三节，每节前都引用了民间歌谣或民间传说。作者采用了民间文学的素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题材更与民间文学接近。一开篇，就描写了一幅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令人陶醉神往的乌克兰乡村的初夏风光，随即又转入了具有浓烈地方色彩的农村集市盛况的描写。接着作者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描写了格利茨柯和帕拉斯卡富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其中也穿插了帕拉斯卡的后母赫芙拉同神父的儿子亚芳纳西·伊凡诺维奇的滑稽调情。

一天，索罗庆采市逢集。漂亮的小姑娘帕拉斯卡坐在马拉的货车上，同父母一起来赶集。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小脸蛋，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上面，竖起两条柳叶般弯弯的黑眉毛，玫瑰色的嘴唇上浮起天真的微笑，扎在头上的红蓝缎带跟长辫子和一束野花一起，像华丽的王冠一样，静静地躺在她那可爱的头上。她的美貌引起路上所有的青年男子的注目，博得了一个叫格利茨柯的青年小伙子的爱慕与倾心。他当即夸奖帕拉斯卡的美容。帕拉斯卡看到，这个小伙子人品出众，身穿一件白罩褂，头戴一顶灰色羊皮帽子，长着一张晒黑的、但却洋溢着欢悦的脸，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明亮的眼睛。两人一见钟情。可是，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后母的坚决反对，眼看就要告吹了。茨冈青年们帮助格利茨柯巧施妙计，利用红褂子和猪妖闹鬼的传说，首先迫使姑娘的父亲契列维克赞成女儿与格利茨柯的婚事。正当帕拉斯卡同格利茨柯举行

婚礼时，姑娘的后母——“母老虎”赫芙拉刚从外面买东西回来，一进门便嘶着嗓子叫喊起来：“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这件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话，人们哄笑着把她推到后屋里去了。然后几对男女围着新郎新娘，在他们身边筑成一道穿不透的舞墙。一对情投意合的青华男女，经过一场小小的波折之后，终于成了眷属。

小说中与帕拉斯卡和格利茨柯的良缘形成鲜明强烈对照的是赫芙拉与神父的儿子亚芳纳西的喜剧性的偷情。赫芙拉乘丈夫外出“守夜”时，将亚芳纳西勾引到自己的家里来，正当两人眉来眼去，互相调戏，动手动脚的时候，赫芙拉的丈夫领着一群人来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吓得他们两人浑身打颤，脸色发白。赫芙拉急中生智，指着天花板要亚芳纳西躲到上面堆满的杂物当中去，然后才丧魂落魄地去开门。进来的人虽看到了赫芙拉神态反常，但他们热衷于继续讲红褂子的传说和乡书记在坍塌的谷仓里遇见鬼怪的故事，也就无心去追问其究竟了。然而，事情真凑巧，躲在天花板上的亚芳纳西被人们极力渲染的鬼怪故事，吓得滚了下来。可是，他并没有被人们捉拿住，反而加强了人们的恐怖情绪，误认为是鬼怪显形，个个被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吓得阻战心惊：有的用羊皮袄蒙着头，绝望地呼喊“救命”；教父惊醒过来后，战战兢兢地爬到老婆的裙子下面；一个高个子，顾不得洞口狭小，拼命地往暖炉里爬，然后把炉门严严实实地关紧，差点闷死在里面；赫芙拉的丈夫契列维克则吓得魂不附体错把瓦缸当作帽子顶在头上，冲出门外，像疯子似的在大街上直奔，也顾不得看清脚下的路，直到奔跑得疲劳了，才放慢脚步，他的心像风车的石白般的跳动，汗珠像冰雹似的直往下掉，最后疲倦得昏迷地倒在地上。亚芳纳西乘这种混乱之机而溜之大吉。一场极富讽刺意味的通俗笑剧便这样结束了。

果戈理以幽默的笔调，通过两种具有不同美学价值的男女私情的描写，对青春的欢乐、对纯真的爱情、对乌克兰人的爽朗性格进行了热情的赞颂。但是，作者在对生活的主导旋律进行赞颂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他对社会现实前景的担忧。小说中，在描写了格利茨柯同帕拉斯卡结婚的热闹场面之后，有一段抒情色彩极浓的文字，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骚音、笑声、歌声慢慢地静了下来。弦索渐息，含糊的音响减弱下去，消失在空漠的大气中。什么地方还可以听到顿足的声音，有点像遥远的海洋的低语，不久一切都变得静寂而消沉了。

“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两声来表示快乐的么？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了哀愁和荒凉，迷惑地谛听着。蓬勃而放纵的青春的、活泼的旅伴，不就是这样跟着一个在世间消逝，最后，把一个老伙伴孤孤单单地撇在后边？遗留下来的人可真寂寞啊！心里感到沉重而悲哀，毫无解脱的办法。”

如果说，悲沉的情绪在《索罗采庆市集》中还只是一股细细的暗流的话，那么在《圣约翰节前夜》里，这种情绪就表露得非常明显，并且成了它叙述的基调。这篇小说写的是青年长工彼得鲁西和他主人的女儿碧多尔卡真诚相爱，遭到父亲的反对而造成的爱情悲剧。碧多尔卡爱上了她家的青年长工彼得鲁西。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他的父亲因嫌彼得鲁西家道贫寒，手中无钱，执意反对，强迫她嫁给一个很有钱财的波兰人。碧多尔卡不从，决心以身殉情，并要七岁的弟弟伊瓦西把她的决心和父亲的逼嫁情况转告给彼得鲁西。彼得鲁西则无可奈何，变得消极颓废，借酒浇愁。正当彼得鲁西狂饮时，一

一个叫巴莎甫留克的魔鬼来到酒店，拍着腰间的钱袋，表示他非常富有，只要彼得鲁西答应在圣诞节前夜到一个深山峡谷中摘一枝凤尾草花，他就可以送许多钱给彼得鲁西娶亲。彼得鲁西答应了。那天夜里，彼得鲁西小心翼翼地穿过茂密的森林，走进深山峡谷，巴莎甫留克魔鬼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当时，四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手挽手地走过泥泞的沼泽，常常被丛生的荆棘钩住，几乎是一步一滑，好不容易才走到一处平地。魔鬼停了下来，对彼得鲁西说：你看见前面有三个小山丘吗？山丘上有各种各样的花，别的花你都不要去采摘，

“等到凤尾草开了花，你把它摘下来就走，不管身后发生什么事情，你也别向头去看。”说完这些话，魔鬼就隐没不见了。突然天边打了个闪电，接着便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大片鲜花野草，其中也有含苞未放的凤尾草——一眨眼，小小的花蕾变红了，像活的东西一样，蠕蠕而动。越动越大，愈长愈红，红得像火焰一样，照得周围通明透亮。正当彼得鲁西想伸手去摘凤尾草花时，他觉得背后有无数双毛茸茸的手向前伸出，也要去摘那朵花。他使尽全力，把花摘了下来。这时，魔鬼又出现在彼得鲁西的面前，它运用魔术，变幻无穷，先使草地上出现一座房子，接着房子里跑出一条大黑狗，狗又变成猫，猫又变成一个老妖婆：她脸褶皱得像干苹果，身子弯得像一张弓；鼻子和下巴连在一起，像把夹胡桃的钳子。这个面目可憎的老妖婆，从彼得鲁西的手中把花夺过去，俯下身子念念有词，从口里喷出火焰，然后把花交回给彼得鲁西，并要他掷掉。彼得鲁西接过花来，向空中掷去。说也奇怪，花竟掉不下去，却长久地像火球一样在黑暗中闪耀，慢慢往下沉，终于消失在遥远的地方。然后老妖婆叫魔鬼将一把铁铲送给彼得鲁西，要他朝地底下挖，说里面有金子。挖了一阵子，果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只铁箱子，他正想伸手去拿时，箱子却往土里陷下去了，而且越陷越深。这时，老妖婆一边说：“要是不流一点人血，你是找不到金子的！”一边又把一个用白床单蒙起来的六岁左右的孩子带到他面前，示意彼得鲁西把孩子的首级割下来。他气疯了，怎么能够杀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呢！他揭开头上的床单一看，原来是碧多尔卡的弟弟伊瓦西。这时他像着了魔一样，挥着刀向老妖婆扑去。老妖婆顿脚放出蓝色的火焰，把地底照亮得像水晶一样，一箱箱一锅锅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映入眼帘，它们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诱着彼得鲁西，他挥刀杀掉了伊瓦西。魔鬼的笑声从四周轰然而起，狰狞的魍魉成群地在他面前蹦跳，老妖婆双手拘住伊瓦西无头的尸休，像狼似的吸吮里面的血……彼得鲁西头脑旋转，双目晕眩，拼命地跑回自己的茅舍，一觉睡到第三天才醒。前几天发生过的事情，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他伸了一下懒腰，忽然听到脚边喀嚓一声，一看，原来是两袋金子。有了两袋金子，碧多尔卡的父亲柯尔日才答应女儿同他结婚。小两口婚后过着丰衣足食、相亲相爱的生活。但彼得鲁西受到良心的谴责，整天疯疯癫癫，痴痴呆呆。由于替爱人担心，漂亮的碧多尔卡也日见骨瘦如柴，脸上退去了红润的光泽。有人提出请巫婆来给她丈夫治病。彼得鲁西一见巫婆，便回忆起了自己被她唆使所干的坏事，一怒之下，用斧头把巫婆砍死。这时，伊瓦西被杀的尸体出现在房间里，彼得鲁西则化成一团烟雾飘去，无影无踪了。碧多尔卡因失去了爱人而悲痛欲绝，随后她卖尽家产，流落他乡，不知去向。也有人传说她到很远的地方出家了。

作者通过这个说神道怪的情节，热烈地歌颂了碧多尔卡对爱情的忠贞和彼得鲁西在追求幸福生活中所表现的崇高品德，说明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是

邪恶势力造成的。一个人如果被利欲所迷惑，就会造成灭顶之灾。这就是作品的深刻寓意所在。

《五月之夜》和《圣诞节前夜》这两篇作品都写得优美动人，玲珑剔透，富有诗意，充满着激励人们振奋精神、积极向上的活力。

《五月之夜》，描写青年哥萨克列夫柯和同村姑娘甘娜相恋，但列夫柯的父亲——本村的村长——从中作梗。列夫柯一次邂逅女落水鬼，并帮助她抓住了陷害过她的妖精。美丽的落水鬼为了答谢列夫柯，巧妙地扫除了他和甘娜爱情上的障碍，把愚蠢贪色的老村长嘲弄了一番。老村长不但好色贪杯，而且对村里的人极尽压迫之能事，因而引起了全村人的普遍不满。有一个青年愤愤不平地对伙伴们说：“哥儿们，我们为什么是奴才？难道不跟他一样是人嘛！谢天谢地，我们是自由的哥萨克！”在令人窒息的沙皇统治时代，这些激情洋溢的话语，的确是号召争取平等自由的响亮的号角；而列夫柯同甘娜的圆满结合，就是自由取得胜利的象征。

在《圣诞节前夜》里，也出现了魔鬼帮助青年实现爱情理想的奇妙故事。机灵勇敢的铁匠伐库拉，爱上了美丽活泼的姑娘奥克桑娜。调皮的奥克桑娜却和女伴一起故意嘲笑他，说要给她弄到一双女皇穿的鞋子，才嫁给他做妻子。伐库拉为此一筹莫展，闷闷不乐。这天晚上，魔鬼正巧也来戏弄铁匠，伐库拉施展自己的才智，抓住了魔鬼的尾巴，要挟魔鬼把他带到彼得堡叶卡杰林娜的皇宫里去。魔鬼脱身不得，只好服从，腾空飞翔，将伐库拉带到彼得堡，等候他从叶卡杰林娜女皇那里求得一双御鞋之后，再连夜把他赶送回来。伐库拉把御鞋送给了奥克桑娜，两人结成了夫妻。其实，奥克桑娜早就爱上了铁匠，她并不需要什么女皇的鞋子，只是故意出难题并无真要御鞋的意思。而敦厚老实的伐库拉却信以为真，一本正经地去办理。果戈理借此很有风趣地刻画了伐库拉纯朴的性格，诚挚的爱情，善良的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并且寓意深刻地表明了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能够克服生活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最终实现自己美好幸福的理想。这就体现了果戈理的乐观情绪。与此同时，作者还描写了女皇叶卡杰林娜二世关心人民的疾苦，赞赏百姓的爽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鲜明强烈地表露了作者自己的王政主义立场和颂扬贤明君主的态度。

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是《可怕的复仇》。在这个中篇小说里，作者对生活中肯定面的歌颂提到了新的高度，对否定面的揭露批判也较以前更为深刻有力了。作品的故事梗概是：

基辅市镇里，哥萨克大尉高罗贝茨为祝贺儿子的婚礼而大张喜筵，宾主们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太尉的结义兄弟丹尼洛·布鲁尔巴施也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卡吉林娜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从德聂泊河对岸赶来道贺。突然，舞厅中一张狰狞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吓呆了妇女和小孩，男人们也为之惶惶不安。他们都知道，那是无恶不作的巫师的面孔。后来，虽然巫师隐没了，但却给人们心中投下了恐惧的阴影。

深夜，德聂泊河水面上漂游着一叶独木小舟。小舟上坐着丹尼洛和他的娇妻卡吉林娜。她为巫师的出现和耸人听闻的故事而害怕。小舟从一片荒凉的坟地旁边经过时，坟地上的十字架下出现了三具动摇和呻吟的尸体。小舟上的人个个心惊胆战；丹尼洛也不寒而栗。不过，这幻象一下子就消失了。

丹尼洛一行人回到自己的村庄。这村庄坐落在通往德聂泊河的一个狭小的溪谷里。住宅不怎么大，看来限哥萨克平民的村舍差不多，只有一间正房。

墙壁上挂着许多胜利品，如长脚银酒杯、镂金酒杯以及枪剑和长矛等，都是早些年从鞑靼人、土耳其人、波兰人手中夺来的。丹尼洛看到这些东西，好像看见物证似的想起了自己的武功战绩。

一觉醒来后，丹尼洛的岳父嘴里衔着一根外国烟管，怒气冲冲，朝着丹尼洛夫妇的卧室走来，厉声地质问女儿昨晚为什么回来得这么迟。丹尼洛理直气壮地代替妻子作了回答，于是，马上引起了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竟然大动干戈，开枪射击。丹尼洛被岳父打中了左手，殷红的鲜血染满了衣袖。

当天夜里，卡吉林娜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的父亲就是在大尉家里看见的丑八怪，并扬言要娶她为妻。第二天，她把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告诉了丈夫，因而引起了丹尼洛对岳父的怀疑。哥萨克人是喜欢吃汤团和猪肉的。可是丹尼洛的岳父既不爱吃汤团，又不爱吃猪肉。这是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岳父的言行与嗜好，越来越使丹尼洛怀疑起来了。他认为岳父一定是在异乡犯过滔天大罪的人，也可能不信基督教。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想法，丹尼洛在一天夜里，同忠实的仆人斯节茨柯去德聂泊河对岸的海角进行侦察。主仆两人躲在树林中，发现一个身穿红短袄，双手持枪，腰挂一把亮马刀的人从山上走下来。那人正是他的岳父。他们跟踪过去，来到海角岸边，在甜睡的森林中隐蔽下来。丹尼洛爬到树上，仔细观察着那亮着灯光的窗子。他发现岳父脱掉红短袄换上了一件土耳其人穿的灯笼裤，头戴一顶绣满外国文字的帽子，原来的脸在渐渐地改变，变长了，变丑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与大尉家出现的巫师一模一样。接着，他口中念念有词，屋里顿时亮起了玫瑰色的火花；火光中，突然飘来了一个妇女，是卡吉林娜的灵魂——这是巫师用邪法摄来的。巫师要女儿的灵魂答应，让灵魂的主人与他结婚。卡吉林娜轻盈缥缈的灵魂被吓得瑟瑟发抖。丹尼洛明白了，原来岳父是一个背叛祖国和人民，投靠敌人，充当奸细的大坏蛋。

疾恶如仇的丹尼洛，把巫师关进深邃的地窖里，锁上三重锁。一天，卡吉林娜从地窖边经过，巫师花言巧语，再三哀求女儿将他放出来，保证以后不再从恶。心地慈善的卡吉林娜信以为真，放走了作恶多端的父亲。

海边的大道上有一家酒店，许多波兰人聚在那里寻欢作乐，已经有两天了。他们纷纷议论，图谋抢劫丹尼洛的漂亮的娇妻。一天晚上，强盗们漫山遍野而来，围攻丹尼洛的村庄。丹尼洛闻信后，立即组织自己的兵士，带足弹药，披挂上马，冲入敌群，手起刀落，弹无虚发。一场残酷的厮杀在山林中紧张激烈地进行着。当敌人快要被消灭时，巫师又出现了。他一枪打中了丹尼洛，等救兵赶到之时，丹尼洛已经静静地躺在大地上，周围流淌着鲜红的血……

不几天，巫师又杀死了丹尼洛的儿子。

卡吉林娜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气得发了疯。她每天身不由己地喝啊，跳啊；夜里一个人在阴森森的树林里游荡，一点也不害怕。一天清早，她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声称是丹尼洛的老同事，告诉卡吉林娜，说丹尼洛嘱咐，他死后，妻子就要送给这位来客做老婆。卡吉林娜看出客人就是打死丈夫的父亲，她怒不可遏，拿起一把大刀扑杀过去，以泄心头之恨。但来客转手夺刀，反将卡吉林娜杀掉了。等到惊恐万状的哥萨克们赶来抓凶手时，巫师已经跳上马背，逃得无影无踪了。

基辅郊外，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怪事，人们看到天边云雾缭绕的山峰上显现出一个全身披挂、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的勇士，睁着眼睛，似乎在等待

和寻找什么。巫师看见后，心虚害怕，在夜幕即将降临之前，骑马疾驰，妄图逃跑。正要越过一条狭窄的小河时，那个骑士从空而降，挡住了巫师的去路。他在绝望中向基辅圣地跑去，希望神父替他乞求上帝，减轻自己的罪恶。神父不从，巫师将神父杀死，妄图逃往国外。在路上，被那位从空而降的骑士抓住，掐死，尸体被抛进万丈深渊，供群魔啃食。

丹尼洛·布鲁尔巴施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形象，是果戈理早期作品中最感人的英雄人物。他生为反对侵略而战斗，死为保卫祖国而献身；他大义灭亲，对于叛国投敌的岳父坚决予以惩办；他光荣牺牲后，忠魂护国，横戈跃马，四处搜索叛徒，昼夜不息地巡视边界。丹尼洛不仅是一个世代传颂的英雄，而且还是一个真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他既具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为了满足妻子的恳求和顾全儿子的成长，放弃了同巫师的交锋，并忍辱负重地把手伸过去和对方讲和。可是一旦发觉巫师的秘密行踪，知道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之后，丹尼洛对他的仇恨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果戈理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并借助他表现了人民的美好崇高的精神品德和对敌斗争的坚强力量。在丹尼洛牺牲之后，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德聂泊河的诗意盎然的描写，这是俄国文学中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作者笔下的德聂泊河的幽美形象，已不单纯是一幅令人神在的风景画，同时又是雄伟壮丽的俄罗斯祖国的象征，是人民力量无限深广的象征。

短篇小说《伊凡·费多罗维奇·希帮卡和他的姨妈》，是果戈理早期创作中独具一格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外省地主的生活。希帮卡是一个地主，品行并不特别恶劣，是他从属的那个阶级的正牌货。他从小品行端正，勤奋学习。然后进了步兵团，步兵团里其他人到外面去寻找玩乐，他却在家里擦钮扣、捉老鼠或睡觉休息。当了十一年兵，后来升到上尉就回家了，过着一种心灵空虚、死水一潭的寄生虫生活。三十八岁时，姨妈为他物色了一个对象，弄得他手足无措，甚至一想起这件事就毛骨悚然。他与对象坐在一起，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是好，相对无言，半天逼不出一句话来。通过希帮卡这个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可悲前景。但是，在当时的果戈理看来，地主阶级中并非都像希帮卡那样的废料，他的姨妈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地主婆。她拼命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生财有道，致富有方：人家的马车从她的土地上经过，她要收五卢布的过路费；她还寸步不离地跟着长工，监督他们割草，自己也参加干活。她精力充沛，很有实干精神，希帮卡家庄园的繁荣是与她善于经营管理密不可分的。但可贵的是，作者对他们都采用了嘲讽的态度，尽管这种讽刺还是温和的，远不及《死魂灵》中对地主的嘲讽那么尖刻，然而，果戈理的讽刺批判倾向和通过生活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的卓越才能，在这部作品里已初露端倪。这是果戈理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从此，他的创作由浪漫主义进入现实主义，对生活的真实描述越来越占有首要的地位，温和的幽默也逐渐为辛辣的讽刺所代替了。

别林斯基对《狄康卡近乡夜话》评价很高，说它是一部充满“诗情画意”和富有“迷人气息”的佳作。

不可讳言，《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个别地方也有脱离生活真实和神秘悲观的毛病，以及描写景物时堆砌高级形容词的败笔，但这部小说为果戈理的创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却是毋庸置疑的。

《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成功，给果戈理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使他成了一位遐迩闻名的作家。由于普希金的热诚帮助和别林斯基的大力支持，果戈理

迅速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于一八三六年参加了《同时代人》杂志的工作。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果戈理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日益敏锐，对沙俄农奴专制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也愈来愈鲜明。从而，作家的创作视野扩大了，作品的揭露、批判和讽刺也更为有力。果戈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提高，集中地反映在《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等作品中。

《密尔格拉得》

《密尔格拉得》，收集了果戈理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四年创作的四个中篇小说：《旧式的地主》、《塔拉斯·布尔巴》、《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吵架的故事》（以下简称《吵架的故事》）。当时，俄国文学正处于沉闷低落阶段，老作家好像成功地隐退了的老兵一样，或销声匿迹，或沉默不语；而新的知名作家还没有出现。因此，果戈理的这本小说集和后来收集在《彼得堡故事》中的部分作品的出版，被别林斯基称为“我们文学界最可喜的现象”和“一抹美丽的曙光”。

同情歌颂人民，揭露鞭挞寄生阶级，这是贯穿果戈理创作始终的两个方面。不过在前后的作品里，其侧重点和表现手法又有所不同，因此人们不难看出，果戈理不同时期的创作之间，既有连贯性，又有新发展。作者虽然把他的《密尔格拉得》称为《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续篇，但《夜话》中那些神怪的古风习俗已被《塔拉斯·布尔巴》的历史事实所代替，散见于《夜话》中的席人俗物，又在《旧式的地主》和《吵架的故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

《旧式的地主》写的是老地主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普里哈里亚·伊万诺夫娜生活中的几个片断。老两口，感情深厚，相依为命。他们住在一座古老破败的庄园里，房子既矮小，又黑暗，周围杂草丛生，院内冷落凄凉，房子里的摆设也是陈旧不堪，破破乱乱，每逢清早各扇房门就发出种种令人心烦厌耳的吱咯声。阿非那西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就是耗费在吃、喝、睡这种动物式的生理要求上；而普里哈里亚则一心扑在开关储藏室、腌、晒、煮无数量的水果和蔬菜等家务琐事中，此外就是像照料小孩一样照料自己的老伴，日复一日，直至病死。阿非那西埋葬妻子后回到空洞洞的房里时，悲痛欲绝，忧伤不已，泪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流淌。悲哀加速了他的衰老，妻子死后五年，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时，如果仆人不护理他，他会把酱油、菜汤洒满一身；手举起勺子本想送到嘴里，却常常戳到鼻子上去了；桌子上摆了些什么东西他也弄不清楚。最后，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终于忧郁而死。在《旧式的地主》中，作者对宗法农奴制地主阶级衰朽的寄生生活及其庸俗不堪的病态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对其不可挽救的崩溃局势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同时，作品又通过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夫妇热忱好客、相依为命以及普里哈里亚·伊万诺夫娜的早死而给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生活困难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宗法制社会中牧歌式生活的美化，流露了他对封建地主阶级日趋灭亡的同情，为旧式的地主写下了一曲悲哀的挽歌。

《吵架的故事》的主题思想是和《旧式的地主》一脉相承的，但在揭示封建地主的空虚无聊和沙俄官僚集团昏庸腐朽方面，前者要比后者深广得多。中篇小说《吵架的故事》写密尔格拉得县毗邻的两个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原来本是亲密无间、推心置腹的朋友，每天都要见面交谈，一到星期日，伊凡·伊凡诺维奇就穿上皮袄，伊凡·尼基福诺维奇穿上棉布的肉桂黄的哥萨克外套，彼此挽着手往教堂里去。伊凡·伊凡诺维奇的眼睛特别锐利，如果他先看到街心上的一汪水或者什么污秽的东西，他总是关切地对伊凡·尼基福诺维奇说：“您小心呀，别把腿跨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不好。”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对伊凡·伊凡诺维奇也十分亲热，

只要一见面，不管两人所站的地方距离有多远，他总是将拿着鼻烟壶的手伸向伊凡·伊凡诺维奇，并笑嘻嘻地说：“请不要客气！”

可是，有一天风和日丽，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家的女仆替主人晒衣物，伊凡·伊凡诺维奇看到其中有一支他久所向往的猎枪，一见就爱不转睛，赞不绝口，并且迫不及待地穿上衣服，拿起多节的打狗棍，径直往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家走去。两人一见面，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提出用一头黑猪交换猎枪的事，伊凡·尼基福诺维奇执意不肯。伊凡·伊凡诺维奇又提出外加两袋燕麦作为交换条件，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仍然拒不同意。一个急于求成，一个舍不得割爱，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因此，两人都大动肝火而争吵起来。伊凡·伊凡诺维奇挖苦地对伊凡·尼基福诺维奇说，“同自己的枪所发生的关系就像一个傻子守着一个锦袋一样”，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也毫不示弱地回敬对方，骂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一只真正的雄鹅”。两人声色俱厉，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口头上双方申明从此断绝来往，而且事实上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人互相控告，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弄得双方倾家荡产、心力交瘁（一个皱纹满脸，一个头发雪白），演出了一幕人间稀有的“喜剧”。

以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为代表的外省宗法地主的生活已如此空虚无聊，那么，那些自称为“父母官”的执政者的精神世界又将如何呢？密尔格拉得地方法院占用了县城里最好的房子；法官带头贪污受贿，平常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办案时也是敷衍塞责，心不在焉，甚至大打瞌睡，连呈文都未听清楚，就签署判决书。然而，为了两个伊凡吵架这样无聊诉讼案件，法院却慎重其事，倾巢而出，进行调解。县城小镇的市长，掉了一颗纽扣，便闹得满城风雨，要他的下属村长扣市区管理员们忙忙碌碌地找了两年尚未了结。地方官员尚且如此昏庸腐朽，胆大妄为，横行霸道，高级法院的官僚们其胡作非为的程度，鱼肉人民的黑心，就更可想而知了。小说里虽未对此作正面的描述，但读者从两个伊凡由于多年的诉讼而带来的可怕后果中，就可以窥见其肮脏的内幕了。因此，果戈理以一幅泥泞阴暗、秋雨濛濛、乌鸦垂头、瘦马哀鸣的凄凉画面结束了这篇小说，最后，无限感叹地写道：“这个世界真是烦闷，老爷先生们哪！”

从《吵架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作者把对封建地主的揭露批判与对沙俄官僚专制的揭露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果戈理的创作向纵深发展的标志，是他创作中又一次出现的新因素。作者对沙俄官僚集团的描写虽然着笔不多，但已画龙点睛似的把它的反动腐朽性深刻地揭示了出来。人们不难看到，地主和官吏们的精神世界已如此空虚无聊，沙俄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已如此昏聩腐败，它的崩溃瓦解之势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如果说，没落腐朽的农奴制现实使果戈理感到忧伤窒息的话，那么，俄国人民英勇豪迈的光荣历史却唤起了他引为骄傲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作者把这种感情全部倾注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因此，与《旧式的地主》、《吵架的故事》不同，呈现在《塔拉斯·布尔巴》中的已不再是阴暗、猥琐和否定的生活，而是光明、雄伟和肯定的生活了，其主人公也不再是伊凡·伊凡诺维奇那样的“俗物”废料，而是酷爱自由、勇敢坚强的哥萨克人民，它的杰出代表就是老英雄塔拉斯·布尔巴。

塔拉斯·布尔巴不但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是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而且在整个俄国文学的画廊里也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作者以十六世纪乌克兰哥萨克人民反对波兰贵族地主侵略者的斗争为背景，用英雄史诗的语言，充满着

崇敬爱慕的感情，描绘了增拉斯·布尔巴的光辉形象。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民族根基和鲜明民族特色的人物。慍悍尚武精神和对信仰的无限忠诚，是他性格的基础。他只是在稀有的时间内，才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而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戎马功绩和为祖国服务。作品一开头，就描写了塔拉斯·布尔巴同两个刚从神学院毕业回家的儿子摔跤的情况，这个极富喜剧性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这位老英雄的豁达、乐观、豪放、幽默的性格特点。他对儿子打心底里爱护，因为在他看来，体格健壮、意志坚强的儿子，必将成为重要的武士，成为捍卫祖国和自由的英雄，否则，一个人便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不顾妻子的劝阻，第二天便把两个儿子送到哥萨克军营——希池去了。他热爱祖国和周围的伙伴，祖国和哥萨克集体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没有比团体更为神圣。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自己的父母。野兽们也爱自己的小兽仔，不过这却不同了！因为惟有人类才能不凭血统而靠精神来结成亲属。他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远远高出于私情和血缘关系。为祖国和民族，他可以大义灭亲。当他得知小儿子安德莱，经受不住美女的诱惑，叛变祖国，背弃哥萨克集体，投到敌人脚下后，他惊怒异常，让人把安德莱诱骗到指定的地点，喝令安德莱下马，并大义凛然地叫道：“站住，不许动，我养了你，我也要打死你！”接着，亲手开枪打死了这个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不肖之子。大儿子奥司大普在同波兰侵略军的战斗中被敌俘虏，布尔巴深切地怀念他，并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障碍混入敌营，去看望儿子。当他看到儿子在法场上威武不屈、英勇就义的悲壮场面时，他含悲忍痛，高度赞扬自己的儿子的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顽强精神，情大大大大高喊：“好！我的儿子，好！”为此，他险些儿被敌人抓住。痛定思痛，乃人之常情，布尔巴在大儿子英勇牺牲之后，觉得如万箭穿心，泪水倾盆，悲痛至极。应当进一步指出，布尔巴之所以对奥司大普被敌人杀害而不胜痛惜，不仅因为牺牲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还因为他是祖国和人民的优秀儿子。布尔巴对儿子要求很高，他自己更是坚强、刚毅，老当益壮。当乌克兰受到波兰封厘帝国的侵略时，她不顾自己已经年老退休，仍然坚决果断地奔赴沙场，英勇地抗击敌人。最后，在德聂斯特河同敌人作战时，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而遇难被俘。敌人用铁索把他捆在树上，点起熊熊大火将他烧死。在临危时，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突围的同胞们的安危，并大声呼喊，指挥他们同敌人继续战斗。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不仅是一个慷慨无私、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一个性格爽朗、放荡不羁、有点大男子汉主义和原始性复仇心理的普通的哥萨克。所以，别林斯基认为，塔拉斯是哥萨克民族的概念的代表，是它的灵魂的广阔发挥的结晶。

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不仅塑造出了塔拉斯及其大儿子的英雄形象，而且非常鲜明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哥萨克士兵舍身忘我、英勇杀敌、血洒疆场的伟大而壮观的事迹。因此，别林斯基赞誉这个作品是一首“瑰丽的叙事诗”，可“足与荷马媲美”。

《彼得堡故事》

继《密尔格拉得》之后，果戈理又出版了另一本小说集——《彼得堡故事》，其中包括《涅瓦大街》、《肖像》、《鼻子》、《马车》、《罗马》、《狂人日记》和《外套》。在此以前的作品，还只是描写外省的穷乡僻壤的地主生活，而在这一组小说中，却描写沙俄首都的黑暗现实，尤为突出的是，作者义愤填膺地叙述了生活在沙俄官僚专制社会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以尖锐的笔锋剖示了这一制度戕害人类灵魂的反动实质，从而使他的创作题材以及创作中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都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是果戈理从一八二八年起在首都七年供职期间对生活观察的产物。他在彼得堡虽说是担任封地局文牍之类的小职员，但却使他有机会同“上流社会”的人接近，有机会耳闻目睹“大人物”的所作所为；有机会同各种各样的作家，学者、演员和画家交往；有机会熟悉使人眼花缭乱的京城生活。一八三六年，果戈理在给波里津的一封信中写道：“外省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变得模糊了，它的轮廓已经暗淡了，然而彼得堡的生活却明显地摆在我的眼前，它的色彩在我的记忆中是鲜明的、强烈的。”

《彼得堡故事》中所描写的生活，完全称得上是沙俄专制社会生活的缩影。它外表富丽堂皇，韶华灿烂，温文尔雅，使人赏心悦目，销魂落魄，流连忘返；但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到，人世间的一切怪事都在这里发生过：

《涅瓦大街》中的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最繁华的大街。作者通过对这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沙皇时代贵族生活的畸形状态。象征帝俄贵族上流社会的涅瓦大街，表面上煊赫繁荣，珠宝耀眼，老爷绅士们彬彬有礼，淑女小姐们玲珑俊秀，车辆人群络绎不绝，件件桩桩都显得超然不凡，像是人间一切最优美的珍品的盛大展览会，使你觉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可是，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切都是虚有其表，在温文尔雅、珠光宝气的掩盖下，不但有为生活劳碌奔波的下层人物，而且还有人类一切东西（包括人的肉体和感情）都可出卖的丑闻。作者在这个表里相违的生活背景中，刻画了两个性格、命运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是画家庇斯卡辽夫，一个是军官庇罗果夫。

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正直善良，感情深厚，富于幻想，有献身绘画艺术的美好意愿，对善与美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同庇罗果夫一道在涅瓦大街散步，看到一个穿戴华丽，身段、线条、脸型都美极了的黑头发女人。在庇罗果夫的怂恿下，庇斯卡辽夫迈着羞怯而战栗的步子，直向那位穿着绚丽的斗篷的女人走去。靠近街灯时，飘荡的斗篷闪出了鲜艳的光辉，但一刹那间却被黑影吞没了。此刻，庇斯卡辽夫心里宜扑通，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他不敢妄想那个飞往远方去的美人儿会对他垂加青睐，庇罗果夫中尉暗示过的那种非分之想，他就更不敢僭望；他只想知道这位艳绝人寰的天仙住在什么地方。他紧紧地尾随美人之后，飞快地跑着，不时把长着灰色络腮胡子的体面先生们从人行道上挤下来。为了避入耳目，后来把脚步放慢了，离开那位美女远一点，他故意东张西望，但暗地里却把美女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来往的行人逐渐稀少了，街上静寂无声，美人儿回头顾盼了一下，他仿佛觉得她嘴唇上闪过了一丝微笑。他浑身直打哆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的全部感情都已燃烧起来，他不顾一切地加速步伐，追随着纤足的轻盈的踪迹飞奔，梦幻似地登上了一幢四层楼的楼房。眼前意外的景象，才使庇斯卡辽

夫醒悟到，他走进了淫乱的魔窟。他怀着神圣的感情尾随的美人儿原来是一个掉进魔窟的妓女。一种看到美被腐朽的淫乱侵蚀掉的感觉刺痛了庇斯卡辽夫的心。他撒腿就跑，像野山羊一样，一溜烟地跑到了街上。他回到自己家之后，垂手低头，像穷人拾到了无价的珠宝而又掉落在大海里一样。为了把这个本来可以成为“一尊女神”的妓女从火坑里挽救出来，他提出与她结婚，但却被那个自暴自弃、堕落成性的妓女拒绝了。他的希望破灭后，精神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中。人们发现，“四天过去了，锁闭的房门一次也没有打开过；又过了一个星期，房门依旧锁着。人们走到门口喊他，可是一声回应也没有；终于打破门进去，找到了他的断了气的尸体，喉咙被割断了，染血的剃刀掉落在地上。从双手痉挛地伸开和脸部可怕的歪曲这些地方可以断定，他的手没肯听使唤，他痛苦了许久，有罪的灵魂才离开他的肉体。”果戈理力图借庇斯卡辽夫的形象说明，在封建帝俄的首都，一切正直、善良、充满崇高理想的青年人，是没有出路的，只能落得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与庇斯卡辽夫相反，中尉庇罗果夫却踌躇满志，平步青云。他不但无一技之长，甚至缺乏起码的羞耻之心，惟一的本领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及其风俗习惯具有非凡的适应性。他一看见美女，就垂涎三尺，想方设法将她弄到手。一次庇罗果夫在涅瓦大街看见一个婀娜活泼的金发女郎，他就紧跟上去，还死皮赖脸地说：“小宝贝，你是我的人儿哟！”金发女郎不理睬他，他却一直追到她的家里。虽然发觉了她是一个有夫之妇的德国人，她的丈夫又粗声粗气地叫他“出去！”他仍毫不知趣地毛遂自荐，说：“我觉得很奇怪。亲爱的先生……您一定没看出……我是一个军官……”德国人用拳头捶打桌子，然后伸出手掌来，对上面啐了一口唾沫说：“对军官就是这样：呸！”庇罗果夫无可奈何地带着威严受到损伤的窘情离开了这个德国人。但当他走到楼梯上时，脑海里又浮现出倩丽的金发女郎的姿影，他就把眼前发生的事全忘掉了。第二天，庇罗果夫以做刺马针为借口，又到这个德国女人家里来了；一见面就说些爱慕的话进行调戏，还做出一副亲热的样子用手指撩她的下巴。为了找机会与金发女郎接触，庇罗果夫不惜花费高价定做刺马针，事后又别有用心地夸奖席勒（金发女郎的丈夫）的手艺精巧，妄图使席勒对他产生好感，放松警惕。后来得知席勒星期天照例外出，庇罗果夫就趁机钻进了他的家里，向他的妻子调情。正当他拥抱金发女郎接吻时，席勒同另外两个手艺人回来了，一看见这种情景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混蛋！你怎么敢跟我的老婆亲嘴？你是下流鬼，不是俄国军官。滚他妈的，……我是德国人，不是俄国猪！……我不要戴绿帽子！扯领子把他抓出去！”于是旁边两个德国人抓住了庇罗果夫的手脚，将他扔了出去。他飞快地跑回家，打算更了衣，直奔将军府去控告德国人的“暴行”。他还想递一份呈文给参谋本部，要是判刑不能令人满意，就再上诉。可是，当他路过一家点心铺，进去吃了两个酥脆的肉馅饼，读了一会儿《北方蜜蜂》，出来时已经不怎么愤然了。又在涅瓦大街蹓跶了一会儿，他决定到检察院院长家里去消磨一个晚上。这个夜晚过得很愉快，因为他的玛佐尔卡舞博得了与会男女舞伴的一致赞赏。

在小说中，果戈理通过涅瓦大街所发生的这些反常事件的对照描写，有力地揭示了沙俄专制社会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及其繁华外表掩盖下的尖锐矛盾。对于这一点，别林斯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种对照包含着多么深长的意义啊！……并且，这种对照产生着什么样的效果啊！庇斯卡辽夫和庇罗果夫，一个黄土长埋，另外一个志得意满。……是的，先生们，这世

上真是烦闷啊！”

短篇小说《鼻子》写一个名叫伊凡·雅柯甫列维奇的理发师，一天早晨吃面包时，发现面包中有一个鼻子。他用破布把鼻子包起来想带到街上去处理：或者塞在大门边柱子底下，或者找个别的什么机会丢掉。可是他一路总是不断地碰着熟人，抓不住这种机会。有一回已经丢出去了，可是一个警察叫住他，对他说：“拾起来呀！你把什么东西丢在地上了！”于是伊凡·雅柯甫列维奇只得把鼻子拾起来，藏在口袋里。他有些感到绝望了，因为这时大小铺子都开了门，街上的人已越来越多，鼻子很难脱手了。后来，他走到桥上，倚栏下望，假装看河里的鱼游，接着就悄悄地将包着鼻子的布包扔到涅瓦河去了。同一天早晨，八等文官柯瓦辽夫一起床，神了个懒腰，叫人把桌上的小镜子拿来。他想看一看昨天晚上鼻子上长出来的那个小疙瘩；可是他大吃一惊，鼻子不见了！原来长鼻子的地方变成了平塌一块。他立刻跑到街上去找鼻子，在一家点心铺门口看见一位从马车里跳出来的五等文官，他认定这人就是自己的鼻子，但此人一眨眼就不见了。后来柯瓦辽夫急着登报寻找和求警察局长帮忙，都没有达到目的。柯瓦辽夫是一个交游甚广的人，鼻子不翼而飞，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一天，巡长给他把鼻子送来了，这真是喜出望外，但却无法安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因为一安上就又被掉下来了。然而事情也真蹊跷，半个月后，他一醒来，偶然往镜子里一瞧，鼻子已经长好了。于是他又出入贵族沙龙，运筹交际。《鼻子》的情节是荒诞的，题材带有很大的幻觉性，但这篇小说却尖锐地讽刺了沙俄专制社会中那种趋炎附势、追逐名利的恶劣风尚。

《肖像》在情节上与《鼻子》颇相似。这个作品在果戈理的创作道路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对资本主义势力揭露批判的崭新主题。作品中的主人公恰尔特柯夫，原是一个具有艺术才华的画家，很有发展前途。但为了发财和追求物质享受，变成了一个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肖像画画匠。他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冲动都转向金钱，金钱变成了他的热情和理想、恐惧和目标，而艺术才能则在他身上已毁灭殆尽。此后，他不但盛装打扮，追求时髦，在宴会上消磨时间，陪小姐太太们游览画展，浅薄肉负地议论前辈大师们的作品，对朋友的一幅神妙之作，出于一种嫉妒心理而冷淡地给予几句不痛不痒的评价。由于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最后发展到一看见有艺术价值和创造精神的作品，脸上就露出恶意，把牙齿磨得轧轧作响，用蛇蝎样的眼光贪婪地对它望着。这时，他心里便产生了人们少有的恶念，并且带着一股疯狂的力量，要求实现这种恶念。“他开始收买艺苑中绝无仅有的精品。他用高价把画买来，小心翼翼地搬进自己的屋里，然后像疯狂的猛虎似的扑过去，撕裂它，扯破它，扯成碎片，发出愉快的狞笑把它踩在脚下”。从来没有一个愚昧的魔王曾经像他这个凶暴的复仇者似的毁灭过这么多美丽的艺术珍品。好在这种毁灭人类文明的罪恶行径没能持续多久，疯狂和癫痫的发作越来越频繁，热病和急性肺炎也猛烈地袭击着他，再加上无可救药的精神错乱等一切症状，使他瘦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终于在最后一次无声的痛苦中结束了他的生命。恰尔特柯夫的死亡，对于世人和艺术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自身艺术才能的毁灭，及其疯狂残暴地毁灭别人的艺术珍品，这是对在俄国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有力批判，极为深刻地表现了利己主义是万恶之源的主题。

但是，果戈理也把神秘主义的幻影带进了《肖像》里。小说的第二部，

更发挥了宗教赎罪的观念。这种违反现实主义原则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说他不应当玩弄这种“荒诞不经的花招”。

《狂人日记》描写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沙俄官僚等级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亚克森齐·伊凡诺维奇·波普里希钦，是一位精神上受到等级制度严重摧残的九品文官。他虽然出身名门，却家道中落，成了一个穷困的小官员。他的职务是在某部的办公室里给部长削鹅毛笔，工资收入低微，甚至难以糊口，穷得身上连一个钱也没有，不得不预支月薪。他穿着褴褛不堪，外套既脏又破。已经四十二岁了，他还娶不起老婆，仍旧孑然一身，孤孤单单过日子。波普里希钦从对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出发，而对那些享乐腐化的上等人、飞扬跋扈的大官吏和虚伪卑劣的同僚们极为不满。这种恨世嫉俗的观念和他欲求步步高升而不可得的处境，使他的思想情绪长时期内处于紧张状态，整天头昏脑涨，卒至神经错乱。有一回，他仅仅对部长的女儿动了情，就遭到了科长的指责怒骂和冷嘲热讽，将他叫到跟前猛加训斥：“放明白些吧！你四十开外的人了——应该长点脑子了。亏你不害臊，你当我不知道你的一套鬼把戏么？你拼命在追求部长的大小姐！喂，你瞧瞧你自己，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窝囊废，再不是别的什么。你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到镜子里去照照你那尊容吧，亏你还痴心妄想呢！”在这位科长先生看来，一个九品文官同部长的小姐谈恋爱，简直是大逆不道、万恶不赦的罪过，仅仅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卑贱者同高贵者就不能建立爱情关系，彼此便没有感情交流的自由，但贵族地主家里的两只狗菲岱尔和美琪却有自由谈情说爱的权利。人不如狗，这是多么违反人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啊！由于物质上被掠夺，人格上受侮辱，使波普里希钦担负着过分沉重的精神压力，终于患上了癫狂病，幻想自己不是什么九品文官，而是西班牙的皇帝费迪南八世。从此以后，他对那些谄上压下的同僚表现出鄙视傲慢的态度，对迷醉于功名利禄、把女儿嫁给将军以求升迁的部长也不放在眼里了。可是实际上，他已被送进疯人院，受到冷水浇头，棍棒拷打的严重折磨和摧残。最后波普里希钦向公众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召唤：“他们干吗要折磨我？他们要这可怜虫怎么样？我能给他们干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呀。我精疲力尽，再也受不了他们这些折磨，我的脑袋发烧，一切东西都在我眼前打转。救救我吧！把我带走；给我一辆快得像旋风一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铛，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个世界！再远些，再远些，我什么都不要看见。……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人道主义激情和对官僚等级制度的愤慨以及对沙俄反动腐朽社会的厌弃！沙俄官僚机构中的阿谀奉迎，追求虚荣，趋炎附势等卑劣风尚，在《狂人日记》中受到了一次严正的裁判。正是立足于这种民主思想倾向的基础上，果戈理既同情波普里希钦的不幸遭遇，又讥讽他长期在政府高级机关中养成的官场通病。

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看，《狂人日记》也是一篇十分别致、独具一格的小说。作者把生活上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构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作品中有些是对疯子混乱心理的真实描写，但大量的是假借狂人的昏热之言，对沙俄官僚等级制度和官场腐败黑暗的现实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料。作者常常在逻辑混乱的语段中，插入思想深邃的描述，在近乎滑稽的嬉笑里，对沙俄丑恶的现实加以无情的怒骂。小说的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结构布局，不但便于通过当时十分严格的检查制度而得到发表，而且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给读者一种别开生面的鲜明印象。《狂人日记》不但被俄国的作家所重视，而且对我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题材和主题方面与《狂人日记》最接近的是《外套》。人们公认，《外套》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篇描写“小人物”的重要作品。它写于一八四一年，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比《狂人日记》更为成熟。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含着热泪描述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巴施马奇金的低微地位和不幸遭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最富于概括性的小公务员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保护，没有任何人重视，谁也不关心的人物，是冷酷无情，灭绝人性的沙俄官僚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他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生是对等级森严的沙俄官僚制度发出的强烈抗议和血淋淋的控诉。

巴施马奇金出生时，教母给他取名字，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结果不知怎的将他命名为巴施马奇金（俄文意思是鞋子）。巴施马奇金长大后，在某部里提任抄写公文的九品官，数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热心服务，但他得来的却是“两袖清风，一身毛病”和大家的歧视与嘲弄。部长和下属各级长官换了许多任，而巴施马奇金总是坐在老地方抄抄写写，不但部长对他冷淡粗暴，就是什么副股长一类的小官也可以随便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命令式地说：“请抄一遍！”更有甚者，官僚们常常拿他开玩笑，作为消遣的对象。诸如：捏造他与七十岁的房东老太婆有暧昧关系，挖苦地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有时又把纸撕碎，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看门人也瞧不起他，当他走进大门的时候，不但不站起来，甚至望都不望他一眼，把他当作一只苍蝇飞过接待室，从来无人理睬。巴施马奇金面临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可怜巴巴地哀求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

在重官衔轻人品，弱肉强食，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在常年累月、时刻不停的缮写工作中，不仅损坏了巴施马奇金的身体健康，而且摧残了他的才能，歪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可怜人物。有一个司长认为巴施马奇金在部里服务多年，于是给他分派一件比普通抄写更重要一点的工作，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草拟一份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事情只须换一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就行了，他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满头是汗，结果还是不行，只好央求：“还是让我抄写点什么吧。”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对巴施马奇金来说，除抄写之外，仿佛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似的。他不论看见什么，都似乎是看见自己所写的清晰的字行。甚至食而不知其味，有时连苍蝇也一古脑儿地吞进肚里。觉得肚子填饱了，他就从桌子边站起来，拿出墨水，抄写带回家来的公文。至于穿着好坏，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令人窒息的官府气氛，机械重复的抄写工作，使他变得呆痴孤僻，麻木不仁，在精神上失去了任何要求，甚至失去了保卫自己的愿望。

然而天气是不容情的，北国首都刺骨的寒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衣着破烂而单薄的小公务员巴施马奇金袭来，冻得他脑门发痛，眼泪直流，他这才发现自己穿了多年的外套已经破了几个洞，需要缝补一下才能勉强挡挡风寒。但当巴施马奇金听到裁缝彼得洛维奇说，旧外套已无法修补，需要做一件新外套时，便如晴天霹雳，大难临头，使他陷于神志恍惚的状态之中。本来他要回家，却糊里糊涂地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从一栋正在兴建的房子顶上劈头盖脑地撒下一些石灰，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做一件新外套，本来是一

桩小事，竟然对巴施马奇金产生了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其经济拮据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攒钱做一件新外套，他决心紧缩开支，每天晚上不喝茶，不点蜡烛，如果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就到女房东的房子里去借光；步行时脚轻轻地落地，踮起脚尖走，免得鞋底磨损得太快；尽量少给洗衣妇洗内衣，为了免得弄脏，每次回到家里就把内衣脱下，光穿一件棉罩衣……这样左省右扣，处处节约，精打细算，费尽心血，好不容易才凑足资金，做了一件美观大方的新外套。当外套到手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意味深长的表情，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仔细地、反复地端详着外套，犹如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地向司里走去。他每一瞬间都感觉到自己身上穿着新外套，内心非常高兴，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当天，司里的一个副股长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晚上，巴施马奇金穿着那件美观大方的新外套出席了副股长的宴会。参加宴会的人个个都羡慕他的外套。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遇上了几个蓄着长胡子的人，他们大声地呵斥他，用拳头惊吓他，抢掉了他的新外套，并用膝盖把他顶倒在雪地上。当他苏醒过来时，只觉得旷野中寒气袭人。他发出了绝望的呼喊声，朝着岗警跑去。岗警并不理会这件事，建议他找巡长。他狼狈不堪地回到家后，房东老太婆替他出了个主意，要他找警察分局长。分局长不但不及时追查此案，反而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司里有人提议他找“大人物”。“大人物”不但不给他想办法尽快地追查处理，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这就大大地加深了精神上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巴施马奇金的内心痛苦。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重压终于导致他疾病暴发，断送了他可怜而微弱的生命。他死后景况萧条，留下的遗物只有一束鹅毛笔，一帖公文纸，三双袜子，两三颗从裤子上脱落下来的铜扣和那件已经不能再缝的长衫。部里不但不知道他的死讯，在他被埋葬了几天之后，还派看门人找他去上班。巴施马奇金在死前昏热状态所说的胡话中，翻来覆去，杂乱无章地提到“新外套”、“捉贼”、“大人”等话语。不难看出，失掉外套只是他致死的偶然事件，造成他一生凄凉而终于无辜丧命的真正原因则是那些仗势欺人的将军“大人”及其所维护的官僚专制制度。

为了表达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复仇情绪和摆脱困境的强烈愿望，果戈理以幻梦的手法描写了巴施马奇金的幽灵大闹彼得堡，一时轰动了全城。幽灵对着过去捉弄巴施马奇金的官吏，用手指恫吓；抓住“大人”的外套领子和他辩理；举起大拳头逼问警察：“你要干什么？”最后幽灵的身段显得越来越高，昂首阔步向前走去。作品结尾的这种艺术处理，从形式上看，虽然显得有些怪诞，然而，它却寓意深刻地揭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而那种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社会统治阶级断然得不到持久的安宁。由此可见，果戈理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映生活的深度，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别林斯基说：《外套》是“果戈理的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标志着果戈理创作的新发展，也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普希金的《驿站长》一起，给上世纪四十年代及以后的作家开辟了一条继续发掘“小人物”主题的广阔道路。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出来的。”由此可见，果戈理的这篇小说对俄罗斯作家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果戈理世界观方面的缺陷和矛盾，在《波得堡故事》中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中篇小说《肖像》里，作者认为，恰尔特柯夫由一

个善良、智慧而崇高的爱国分子、民族艺术与科学的积极庇护人，只因借了一个神秘的放印子钱的希腊人的债，才忽然变成一个蒙昧论者、恶棍和文明的压制者，如果不向这个希腊人，而是向别的什么人借债的话，他就不会堕落而依然如前。作者本来想写一个因贪图名利而毁掉自己和别人才能的画家，但同时却宣扬了人的德性依赖于宿命的错误观念。贪名图利使一个艺术家彻底毁灭的创作构思，凭借作家的才能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本来可以很好地完成的，可是他却编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放印子钱的希腊人，特别是那个长着一双灵活眼睛而又不翼而飞的肖像；这些脱离现实的描写，即使写得更精巧，更富有讽刺性，也不能给他的作品增添任何光辉。诚然，这些缺点只是白璧之瑕，决不能因此而否认白璧本身。

由于果戈理创作的批判倾向更加深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日益巨大，因而《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反动批评家布尔加林在他主办的刊物《北方蜜蜂》中，咄咄逼人地责问果戈理：“为什么要描写生活与人类的肮脏后院的不愉快的图画？”另一个反动杂志《读书文库》也谩骂果戈理的作品“非常下流”。正当果戈理遭受敌人的围攻而感到困惑时，别林斯基伸出了援助的手，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称赞他继承和发扬了冯维辛、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所奠定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和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称赞他有着强大而非凡的才能，是文坛的盟主和诗人的魁首。同时还精辟地指出了果戈理的创作具有“朴素的构思，十足的生活真实”，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独创性等艺术特点。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对果戈理的支持、鼓舞很大。据安宁柯夫回忆：果戈理“对这篇文章表示很满意，不但满意，并且感到幸福。”正是在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激励下，果戈理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两部流传全球、千古不朽的名著——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史诗《死魂灵》，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主要代表作品

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果戈理于一八三三年开始构思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一八三五年底完稿。一八三六年初夏在亚力山得拉剧院首次上演这个喜剧，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首次上演后，又经过了反复修改，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最后定稿，花费了他不少心血，体现了果戈理对待文学创作严肃认真、审慎精勤的态度。

在《钦差大臣》中，果戈理通过外省某县的官僚集团，把一个从彼得堡来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当作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所引起的一场慌乱，以及城市居民的强烈反响，对沙俄官僚专制的腐败现象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尽情的嘲笑和有利的批判，为现实主义讽刺文学提供了新范例。

剧情是围绕“钦差大臣”的到来展开的。外省某县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突然接到爱友加亲家安德列·伊凡诺维奇·奇密霍夫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近闻有某大员奉旨来省视察，对于我县，尤为注意。该大员虽以常人面貌出现，然弟之消息，确系来自可靠方面。弟知吾兄与世人相同，亦有小过，盖因吾兄系聪明人也，凡财物到手，均不欲有所遗漏.....故敢奉劝吾兄，诸事务宜留意，该大员虽尚未到达，亦不知隐名匿居何处，然恐将随时抵境.....”得信后，市长非常着急，赶忙把城里的要职官员找来，共商对策。同僚们听说彼得堡派了钦差大臣，带着秘密使命进行微服私访，个个心中惶恐不安。

为了蒙混过关，市长向官僚们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要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安排人把病人的帽子弄干净，每张病床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病人名及患病日期，还将一些病人藏起，以减少病号；他要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注意清理法院，把法警们养的鹅赶出候审室，把自己打猎用的长鞭子从法庭的柜子上取下来，同时帮助陪审员去掉身上的怪气味；他吩咐督学鲁加·鲁基奇对各位教师特别加以“照管”，以免“莫测之事”发生；.....市长对自己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的罪恶，则自欺欺人地加以辩解，说：“没有一点罪恶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上帝安排的。”虽然他作了周密的布置，并且自我安慰了一番，但做贼心虚，害怕钦差大臣发现其中的破绽而给他以严重的惩罚。他担心商人和市民们告他的状，心神极不安宁。于是又命令邮政局长把邮局里所收发的信件都拆开瞧瞧，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告，要是没有，就把信件封起来，甚至敞着口送出去；如果发现告密信，立即“把它扣留下来”。心怀鬼胎的邮政局长早就干起了这种无耻的勾当，他把拆人家的信件当作一种娱乐和嗜好，在此以前，他已经拆阅了人家大量的往来信件，因而对上司的指示心领神会，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正当全城的官僚们忧心忡忡地商量对策时，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气喘吁吁地跑进市长家，上气不接下气地争着向市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身穿便服的青年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仪表非凡，此人一定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

一听说钦差大臣已经到来，官僚们个个吓得惊恐万状，担心大祸即将临头；市长连忙在暗暗祷告，乞求诸位神灵默佑他们。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

他决定单独或带一个人，假装散步去探个究竟。官僚们便各自回单位去作“迎接”京城大官员察访的准备。市长命令警察署长派人去打扫通往旅馆的那条街道。由于心慌意乱，竟把每人拿一把扫帚把通到旅馆的那条街打扫一下，说成了“每人拿一条街”；甚至把帽盒当作帽子戴在头上。然后，他带着陶布钦斯基坐着马车朝旅馆驶去。波布钦斯基则紧紧跟在马车后面追。

市长的妻子安娜·安得列芙娜是一个充满俗气的妖冶妇人。她和女儿玛丽亚听到丈夫要会见一位什么大人，赶紧梳妆打扮起来。等她们打扮完毕，市长的马车已经走远了。安娜于是埋怨女儿打扮拖沓，使她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她吩咐女佣阿芙多吉亚追随马车，去打听那新来的人是谁，什么样儿，是否漂亮英俊。女佣飞也似地跑去了。

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陈设极为简陋，靠墙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就是“钦差大臣”的仆人奥西布。这时，奥西布肚子里饿得咕噜咕噜直响，好像整团人在吹喇叭。他埋怨主人因摆阔气和打牌而挥金如土，以至现在身无分文，不仅回不了家，而且连房租和伙食费都无法交付了。主仆二人已经受到了饥饿的严重威胁。此刻，他的思绪进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境界：什么女人啦，彼得堡优美而高尚的生活啦，什么坐马车不要钱啦……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凭直觉经验，他知道是主人回来了，于是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去开门。

进来的果然是赫列斯达可夫。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又高又瘦，甚至有一幅蠢像的男青年。一进门，他便无精打采地把帽子和手杖交给仆人，眼睛往床上一看，立即发现仆人躺过他的床，就对其严加训斥。奥西布辩驳道：“我要床干什么？难道我不知道床是什么吗？我有的是腿，我会站，我要您的床干什么？”仆人反复声明着。主人不做声了，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接着他问仆人是否还有烟丝。其实烟丝早在三天以前就抽完了。主人沉思片刻后，一连三次命令奥西布去餐厅里叫掌柜的开饭，因为他确实饿得没有力气了。奥西布告诉赫列斯达可夫，说掌柜的因为他们有三个礼拜没有给旅馆付钱，不给他们开饭了，还骂赫列斯达可夫是骗子、流氓、光棍和坏蛋；掌柜的还扬言，如果他们继续不给钱，“马上就去找告状，要把他给抓到警察署里去坐牢”。赫列斯达可夫无可奈何，劝说仆人去求情。奥西布只好答应把掌柜找来。

仆人走后，赫列斯达可夫自言自语地说：“我实在想吃东西，所以我出去走走；我本想把饿劲儿挺过去的——不，他妈的，挺不过去。是的，要是我在平时不乱花钱的话，那就有钱回家了。步兵上尉把我骗苦了，这个无赖，牌打得太好了。只坐了一刻钟，他就把我弄光了。可是我却很想跟他再来一盘，只是没机会。……”这几句话，足以说明了他目前的窘境和嗜好。

奥西布终于找来了一个人，但不是掌柜，而是一个伙计。赫列斯达可夫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才对伙计提到“开饭”的事。可是伙计告诉他：“掌柜的说再也不给”他开饭了，并且还要去市里告他的状。赫列斯达可夫再三哀求伙计去说情。好心的伙计答应了，与奥西布一同离开了这个房间。赫列斯达可夫暗自想到：“要是他真的什么也不给我吃，那可糟了。”他真想拿衣服裤子去换钱，但那样做有失体面，他要穿着彼得堡的服装回家。接着，他又幻想着坐马车回家真威风，如果在地主的台阶前面一停，马上就会使人们惊慌起来，他会受到热情接待，甚至还会走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眼前谈情说爱。这些幻想体现了他花花公子的性格特点。然而，空空的腹内一阵阵地“叫

苦”，使他美妙的幻想顿时化为泡影。

正当赫列斯达可夫饿得恶心、馋得发慌时，奥西布和伙计把饭菜端来了。然而，他既嫌饭的数量少，又嫌菜的质量差，居然和伙计吵架，骂他是“傻瓜”和“猪崽仔”。不过那些上面浮着鸡毛之类的汤和跟树皮一样嚼不烂的烤肉，确实并非美味佳肴。他觉得很委屈，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但饥不择食，他狼吞虎咽地将伙计送来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吃光了，可是仍不足以饱腹。他想上街去再买点白面包充饥，但又苦于没有钱。正在懊恼之际，仆人告诉他：市长来打听他了。赫列斯达可夫吃惊不小，以至忘却了饥饿。他认为一定是掌柜的去告发了他。这下可糟了！他担心会把他拉进监狱。心想：如果客客气气跟他们讲，也许会无事。于是他振作精神，挺直身子，色厉内荏地说：“我去当面对他说：‘你怎么敢，你怎么？……’”然而，当门上的把手转动时，他已经吓得浑身打颤、脸色发青了。

门一开，市长进来了，后面跟着陶布钦斯基。市长一进门就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了，并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同样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市长。双方对望了几秒钟，心情都非常紧张。然后，彼此客气地问了好。接着，市长低声下气地向赫列斯达可夫道歉。赫列斯达可夫起初回答时还有点儿口吃，后来便逐渐大声说话了。他说钱一定会付，但掌柜的太不对了，给他吃的牛肉硬得像木头一样，汤里不知放了些什么东西，茶水又有一股腥味……市长战战兢兢地听着，作了一些解释，并请他“搬到别的住宅里去”。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市长是叫他进监狱，就态度坚决地回答：“不，我不去。您有什么权力？您怎么敢？”“您把所有的队伍带来——我也不去！”还歇斯底里地边说边捶桌子：“我会直接去见总长！您算什么？您算什么？”

市长看到赫列斯达可夫的这种态度，以为是商人们向“钦差大臣”告了状，吓得浑身发抖，进而苦苦哀求，并不打自招地说：“求求您，不要害我！我有妻室儿女……不要使我成为一个不幸的人。”“我没有经验，手头又窘。请您自己想想看：我的薪俸连买茶叶跟糖都不够，就说我收什么贿赂吧，那也少得可怜：一点点吃的东西，或是一套衣料。至于说那个做买卖的下士寡妇，他们说揍她，那是有意中伤，完全是中伤。这是我的仇人们捏造出来的，这帮人打算谋害我的性命。”

听了市长这席话，赫列斯达可夫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市长是要揍他，便大声嚷道：“您不敢揍我。”“我会付的，我会付钱的，可是现在，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市长沿着既定的错误思维线索，愈滑愈远，似乎听出了“钦差大臣”的弦外之音，认为他是在向自己要钱，于是大声地说：“如果您真需要钱，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马上可以为您效劳。”接着就把四百卢布当作两百卢布“借”给了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这时才觉察出市长真的把他当作彼得堡的要人，于是便顺水推舟，接受了市长的贿赂，并如释重负地叫市长和陶布钦斯基就坐。

市长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并自我炫耀地说：“由于职责所在，我和此地的地主，彼得·伊凡诺维奇·陶布钦斯基，特地到旅馆里来打听一下，对旅客的招待是不是周到，因为我和别的什么事情也不管的市长不同，除了职务以外，我还根据基督教徒的博爱精神，愿意每个人都受到极好的招待。现在，好像给我酬报一样，使我得到结识这样一位好

友的机会。”

赫列斯达可夫向市长表示同样的心情后，便漫天撒起谎来。为了讨好“钦差大臣”，市长请求赫列斯达可夫去他官府做客。赫列斯达可夫答应了市长的请求。

临走时，赫列斯达可夫想把伙计找来算账，准备付钱给旅馆老板。市长却暗示他不要付钱“为了向‘钦差大臣’表功，市长邀请赫列斯达可夫往慈善医院去视察。与此同时，市长又吩咐陶布钦斯基立即将两张条子分别送给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和他自己的妻子安娜·安得列芙娜，要他们立即准备迎接这位京城来的大官员。

市长离家整整一个钟头了。安娜和女儿仍然站在窗前，向市长去的路上眺望。安娜对女儿的责备还没有休止。玛丽亚安慰母亲，说阿芙多吉亚该回来了，再过两分钟她们什么都会知道的。玛丽亚把头探出窗外，突然喊道：“哦，妈妈，妈妈，有人来了。在街那头儿呢！”

“在哪儿呀？”安娜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谁呢？中等身材……穿着燕尾服……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女儿眼尖，认出来者是陶布钦斯基。于是，安娜和女儿把陶布钦斯基迎进屋里，向他打听市长去会见的是什么人，多大年纪，相貌怎样，头发是什么颜色……陶布钦斯基如实地把情况转告了安娜母女俩。安娜从便条上得知，从京城来的官员会住进自己家，并且丈夫要她安排人布置房间，办好酒菜，迎接“钦差大臣”的到来。她喜形于色，心里乐滋滋的。

安娜吩咐妥当，叫女儿同她一道精心打扮一番。母女俩各自选择自己最喜爱、最鲜艳、最合适的服装。安娜为了使自己打扮得迷人，竟不顾女儿的反反对，穿起了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的非常耀眼的浅黄色服装。梳妆打扮完毕后，安娜母女急切地盼望着彼得堡来的这位官员早些莅临。

市长把“钦差大臣”带进慈善医院，在医院里用了午膳。赫列斯达可夫极力夸奖这顿饭做得好。并且忘乎所以，露骨地宣扬“人生在世，就为了寻欢作乐”。老奸巨猾的市长趁机向“钦差大臣”邀功领赏，说他当市长“问心无愧”，“市内一切井井有条，街道扫得很清洁，囚犯的待遇很好，酒徒减少”了。接着他又冠冕堂皇地吹嘘自己“不图任何荣誉”，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荣誉当然是诱人的，但是和道德相比，只不过是浮云轻烟而已。”

赫列斯达可夫并没有听市长的瞎吹，而是向市长打听市里有没有消遣的地方。因为他的牌瘾复发了，要找对手打牌。市长却不明白“钦差大臣”的真正用意，以为是在试探他有无赌博习惯，他便极力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很不喜欢打牌，也没有时间。其实他在前天还赢了督学一百卢布。

饭后，市长把赫列斯达可夫带到自己家里，引妻子和女儿相见。赫列斯达可夫被妖艳的母女俩弄得神魂颠倒了。他以能站在安娜身边为最大的荣幸和满足，故意用一些话来挑逗安娜。安娜则在这位花花公子面前故作媚态，问长问短，说这道那，用一些暗示性的话语来引诱赫列斯达可夫。他们真可谓物以类聚了。

为了尽快地使对方迷恋自己，赫列斯达可夫当着安娜的面大肆吹嘘彼得堡如何之好；他在彼得堡又是如何地被人重视、受人尊敬；部长拍着他的肩膀喊他去吃饭；兵士们从卫兵室里跑出来向他举手行礼，甚至有一个与他熟悉的军官简直把他当作总司令了。他进一步漫天撒谎，说他爱好文学，喜欢编写各式各样的通俗喜剧；跟文学家普希金有很密切的交往，甚至厚颜无耻

地把别人的作品说成是自己与的；还说 he 家里常常开舞会，舞会桌上摆出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锅里的汤是直接由轮船由巴黎运来的。“外交部长、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德国公使”和他一起打威斯特牌……市长和其余的人都胆怯地听他吹牛。他却更显得得意忘形，继续他的弥天大谎。他说有一次为了找他当司长，全城派了三万五千名信差。他去上任时，走过司里，“简直跟地震一样，所有的人都像树叶似地发抖、哆嗦”。市长和其他的听众都吓得直发抖；赫列斯达可夫吹牛可越发起劲了，他说：“我不爱开玩笑，我给他们大家下过警告。连众议院也怕我。……明天我就要升为元帅……”他趾高气扬，手舞足蹈，双脚一滑，几乎倒地。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把醉醺醺的赫列斯达可夫扶住，送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歇息。

赫列斯达可夫的漫天谎话，使在场的人都摸不清头脑。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官，恐怕比将军还要大。

到市长家来陪客的人都各自回去了。安娜母女俩在争论着赫列斯达可夫对谁倾心留意。直到市长在她们面前出现后方才停止争论。市长责备妻子对赫列斯达可夫太随便了。从赫列斯达可夫口中，老奸巨猾的市长听出了许多破绽。为了证实他的判断能力，他把奥西布找来试探虚实。聪明的奥西布巧妙地回答了市长提出的一切问题，使市长坚信他的主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要人。为了讨好主子，市长和安娜都送了一些钱给奥西布。

市长最怕人们告他的状，他吩咐警察站在屋门口，不准任何一个人进来求见“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驾到，还没有找谁的麻烦。为了取得主动权，官僚和地主们商量如何去拜谒他。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了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的建议：分别进见，相机而行。

第二天，赫列斯达可夫睡眼惺松地刚一起床，法官就来拜谒他了。法官向他介绍了自己任官的日期和政绩情况，他一边讲，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赫列斯达可夫发现后问他：“您手里拿着什么？”“这一问，吓得法官惊慌失措地把钞票全部掉落在地，口里却说“没什么”。赫列斯达可夫拾起钱说：“这是钱。”法官认为这下子完了。但他却听到：“您把这钱借给我，好不好？”于是法官便如愿以偿地把三百卢布“借”给了赫列斯达可夫。

在法官的启示下，当邮政局长来拜谒赫列斯达可夫时，后者便主动地提出：“我碰见了一件这样的怪事，在路上把钱全花光了，您能不能借三百卢布给我？”不用说，邮政局长当然十分乐意地掏出三百卢布来讨好这位“钦差大臣”。

后来，赫列斯达可夫采取同样的手段，索取了督学鲁加·鲁基奇三百卢布；慈善医院院长四百卢布；地主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六十五卢布。官僚和地主们全部拜谒完之后，赫列斯达可夫得意洋洋地数起钱来。他向官员、地主们总共索取了一千六百六十五卢布。官僚们把他当作政府要人使他心里十分高兴。他还准备写信告诉彼得堡的朋友脱略皮乞金，想通过他来讽刺挖苦这些官僚和地主们。于是他叫仆人奥西布取来纸笔墨水，把最近的见闻写成一封长长的信。

正当他在写信封时，听到外面闹哄哄的。他朝窗外一看，几个警察正在拦阻几个商人。赫列斯达可夫走近窗前，叫警察们放告状人进来。商人们进来后，纷纷诉说市长为非作歹的恶劣行径。赫列斯达可夫只是似听非听，爱理不理。商人们为了出口冤气，带来了一些礼物送给他。他说自己“不收贿

赂”，但如果借给他三百卢布那是会收下的。于是商人们马上凑齐了五百卢布，用银盘装起来递给他，他连银盘一齐都收了。后来在奥西布的提醒下，商人们送来的一切礼物也全收下了，连一根小绳子也没有放过。

商人们刚走，两个妇女的声音从窗外传来。赫列斯达可夫走近窗前问：“老大娘，有什么事？”两个女人答道：“青天大老爷，求您恩典！大人，请您听我们说几句话！”赫列斯达可夫吩咐让她们进来。进来的是铜匠的妻子和下士的老婆。她们先后陈述了市长给她们带来的灾难。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陈述，听得不耐烦时，就把她们撵了出去。另外一些人来告状，他干脆拒不接见。

告状人刚打发走，玛丽亚就出现在赫列斯达可夫面前了。他一眼看见玛丽亚，立即向她献媚道：“对不起，小姐，我很高兴您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我可以问您吗？您打算上哪儿去？”

玛丽亚回答道：“真的，我哪儿也不去。”

赫列斯达可夫又问道，“为什么哪儿也不去呢？”

玛丽亚答曰：“我想知道，妈妈是不是在这儿……”

赫列斯达可夫说：“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哪儿也不去？”

玛丽亚像是在向他道歉似的说：“我打搅您了。您正在办要紧的公事。”

赫列斯达可夫进一步向她献媚道：“您的眼睛比要紧的公事好得多……您不会打搅我，决不会；相反您会给我带来愉快。”

“此地无银三百两。”原来玛丽亚是来找赫列斯达可夫的；说来找她妈妈，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玛丽亚这样的美人亲自来找他，赫列斯达可夫心中自然喜不自胜。因此，他连忙搬出椅子请玛丽亚坐。玛丽亚羞怯地坐下，赫列斯达可夫与她调着情。在一些暗示性的交谈中，他逐渐把椅子移近玛丽亚，向她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白爱情。少女的羞涩感使玛丽亚挪开自己的椅子，并且说：“爱情！我不懂爱情……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他们两人一个把椅子移近，一个把椅子挪远，后来，赫列斯达可夫干脆亲了亲玛丽亚的肩膀。玛丽亚愤然站起身来，想逃走。赫列斯达可夫心急火燎地拦住她，双脚跪在地上向她求爱。

安娜·安得列芙娜也来找赫列斯达可夫，可惜迟来了一步，一脚跨进门，就看见赫列斯达可夫跪在女儿跟前，大吃一惊：“哎哟，真是笑话！”接着她责备女儿道：“这是什么意思，小姐，这成什么体统！”玛丽亚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在母亲连连的“滚开”声中离开了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从玛丽亚眼前起来后，旋即又跪倒在安娜面前说道：“夫人，您瞧，我快要被爱情烧死了。”安娜假意提醒赫列斯达可夫，说自己“已经有夫之妇了”，但他却说：“这没关系！爱情是没有区别的。卡拉姆辛也说：‘宣告法律无效’。我们逃到世外桃源去。答应我吧，您就答应我吧。”

“妈妈，爸爸叫您……”他们正要山盟海誓之时，玛丽亚的声音打破了他们热恋的气氛。当她看到赫列斯达可夫跪在妈妈眼前时，她也惊呼起来：“哎哟，真是笑话！”安娜曾对女儿的这类行为极为不满，骂她举止轻浮，不懂规矩，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玛丽亚想起遭到母亲无理的辱骂，这时含着委屈的眼泪站在那儿发呆。就在这个时候，赫列斯达可夫转过身来，抓住玛丽亚的手对安娜说：“安娜·安得列芙娜，您不要反对我们的幸福，请您为我们永远不变的爱情祝福！”

安娜吃惊了。此刻，她才醒悟到，在她与女儿之间，赫列斯达可夫到底

是爱年轻的女儿的。为了不露隐情，她在破口大骂女儿的同时，还是赞同了这门亲事。

市长因商人、铜匠、下士的妻子告了自己的状，总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害怕受到处罚，于是他来找“钦差大臣”求情赐恩，开脱罪责。当妻子告诉她“钦差大臣”在向女儿求爱之后，市长揉揉眼睛，快活地跳了起来，疯狂地大声叫喊着“嘿，市长！大功告成了”。

邪法不可久现。赫列斯达可夫冒充钦差大臣，骗取了人们的信任和金钱，如果不早点离开，必然要露出马脚。他的仆人早就为他套好了马车。他们主仆俩马上就要离开此地，返回彼得堡去了。赫列斯达可夫又撒了一个谎，说他要到乡下去看看家叔，花个把天工夫，回来后再结婚。临走时，市长又送了四百卢布给他。他接过崭新的钞票，坐着篷车，飞快地往彼得堡方向驶去，铃铛声渐渐远了……直到从市长的耳畔消失。

虽然赫列斯达可夫的马车铃声在市长耳畔消失了，但是，女儿玛丽亚与“钦差大臣”联姻的喜悦心情犹在胸口激荡。市长兴高采烈地对妻子说：

“安娜·安得列芙娜，怎么样？啊？这种事情您想得到吗？他妈的，真是中了头彩！喂，你坦白说，你做梦也想不到：不过是个市长太太，忽然，呸，你他妈的……竟跟这样一个怪物攀了亲！”他简直把自己当作皇亲国戚，并且决心要让那些上呈文、递状子的人知道点厉害。于是，他下令警察：“把买卖人都叫来，我要重办这些无赖！对于那些代人写状子的人也要记下名字，加以惩罚。”他要警察替他宣传：上帝把无上的光荣赐给了市长，他的女儿许配给一个盖世无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办的伟人；通知全城人，敲钟举行庆祝仪式。

接着，市长飘飘然进入了胡思乱想之中：他想离开县城，进居彼得堡，甩掉市长这个差事，靠做“钦差大臣”的女婿为他谋一个更大的官衔，出入宫廷，直至提升为将军。一谈到当将军，他更加眉飞色舞，神气十足。他厚颜无耻地对妻子说：“他妈的，当将军真威风！有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向妻子征求意见：哪一种颜色的绶带最好。继而市长更加荒唐地幻想当将军后的滋味。他认为一做将军，到什么地方去，马弁和副官就在前面跑着，大声喊道：“马来了！”而驿站上那些职位低下的九品文官、上尉、市长谁也弄不到马，只得干等；他还可以到省长家里吃饭，市长在省长家里只能站着，……说着说着，就捧腹大笑起来。安娜则随声附和，与丈夫共同分享幻想中的欢乐与喜悦。他们甚至想到了当将军以后的生活细节。市长首先谈到的是吃，是彼得堡两种味道鲜美、一提到它马上就流口水的鱼；安娜想到的是如何把家里布置得最漂亮，在最漂亮的房子里放着龙涎香，人一走进来就可以眯起眼睛闻到那种奇特的香味。

警察奉市长之令，找来了商人。商人们一见市长便向他鞠躬敬礼。市长盛气凌人地训道：“……卖茶炊的，卖布的，你们为什么告我？地痞、流氓、海盗，你们告我吗？怎么样，你们胜了吗？你们认为，这回总要把他——市长送到牢狱里去了吧！……”“……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去告状的那位大官员，现在就要跟我女儿结婚了！怎么样？啊？现在你们有什么可说的？现在我要重办你们！……”商人们一齐向他鞠躬请罪，连声说：“我们错了……”市长继续训斥商人们，奚落他们，使得商人们只好向市长求饶。市长灵机一动，趁机向商人们敲诈勒索，改变话头说：“我是不记仇的，不过，现在你们要留神点，要机警点！我并不是把女儿嫁给一个普通的贵族，所以贺礼要

送得……明白了没有？不要随便送点咸鱼或是方糖来凑数……”商人们点着头，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市长家。

官员和地主绅士们得知市长的女儿高攀了“钦差大臣”的消息后，纷纷赶来道贺。他们一走进市长家，就恭维安娜和玛丽亚，走过去吻她们母女的手。许多穿常礼服和燕尾服的宾客前来贺喜，祝福。市长家里拥挤不堪。市长招呼着客人们坐下，然后全家人争着向他们叙述并编造赫列斯达可夫向玛丽亚求爱的过程。客人们非常羡慕玛丽亚的福气，赞赏市长一家人的好运气。安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客人们宣告了市长想去彼得堡当将军的消息。客厅里又响起了一阵赞扬声，同时，有一部分客人马上请求市长当上将军后要照顾他们，他恬不知耻地都一一答应下来。

正当宾主们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中时，邮政局长手拿一封拆开了的信，上气不接下气地朝市长家跑来。一进门就说：“诸位，怪事！我们把那个当作‘钦差大臣’的官员并不是钦差大臣。”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人们大吃一惊。

邮政局长是怎样发现这个秘密的呢？当赫列斯达可夫的仆人奥西布把主人的信投进邮箱后，邮政局长便从信箱中把这封邮往“邮政局街”的信扣留下来了，拆开一看，发现被人们当作“钦差大臣”的人既不是全权特派，也不是大员，而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骗子。

市长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甚至气愤地说要逮捕邮政局长。邮政局长把赫列斯达可夫写给朋友脱略皮乞金的信宣读后，他们才相信自己受骗上当了。赫列斯达可夫对接待他的每个官员都加上了谩骂性的评价，使所有的官僚们气愤至极，羞愧得无容身之地。

受骗上当最大的市长捶着自己的前额，气急败坏地叫道：“我怎么啦？不，老傻瓜啊！我怎么啦？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做官做了三十年，就没有一个买卖人或是包工头能够骗得了我；骗子里的骗子都上过我的当；想一手遮天的流氓和光棍都上过我的钩；我曾骗过三个省长！……省长算得了什么！省长就不值得一提！”进而，他狂怒地喊道：“你们都来看呀，都来看呀，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基督教徒，你们大家都来看市长受了人家的愚弄啦！他真是个傻瓜！这老混蛋真是个傻瓜！”他受骗上当倒不要紧，最怕赫列斯达可夫把这个奇闻传到全世界去，使他成为笑柄，而且最担心会被文人、作家写进喜剧作品，永远被人咧嘴大笑，拍手叫好。他愤怒地训斥了造谣生事、误把赫列斯达可夫当作钦差大臣的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官僚们便围着他俩算账；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则互相推卸责任，彼此埋怨，丑态百出。

突然，一个宪兵出现在众人面前，宣布：“奉旨从彼得堡来的官员，命令你们立刻前去。他现在住在旅馆里。”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大家猛吃一惊。太太们的嘴里齐声发出惊异的叫喊。顿时，宾主们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客厅里……毫无疑问，一场新的喜剧又将重演！

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平时不理国政，专门营私舞弊，鱼肉人民，是一个极端昏庸腐朽、俗不可耐、令人厌恶的官吏。他老奸巨猾，自夸骗过三个省长，骗子里的骗子也上过他的当。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捞到的一切，并且认为这也是上帝安排的，是天经地义的。作者通过市长的言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他精明能干，老于世故，三十年的宦海浮沉，使他精通媚上欺下、四方笼络的官场

权术。他对自己统辖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且巧立各目，勒索他们的钱财；对上级则阿谀奉承，讨好拉拢。他一心想往上爬，去彼得堡当将军，出入宫廷，掌握大权。他是沙俄官僚的典型形象。

赫列斯达可夫却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漫天撒谎，信口开河。同时，他身上还具备上流社会那种庸俗作风和卑劣品性。他对百姓的疾苦、哀告鄙视厌烦，对官僚们的贪污行贿和滥施淫威则习以为常，这是贵族阶级的本性在他身上的反映。他对以市长为首的官僚集团的形象作了很好的补充。他是贵族花花公子和市长等官僚们的接班人的典型，是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人物。他的形象集中地概括了俄罗斯的贵族在经济上开始破败，生活上日益庸俗，精神上更加堕落，剩下的只是吹牛撒谎，妄自尊大和摆空架子的特征。

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嘲讽鞭挞的不只是沙皇政府机关中的个别官吏，而是整个专制制度和官僚集团。法官略布金·加布金专爱打猎享乐，滥用职权，鱼肉人民，因为“读过五六本书”，便以“自由思想者”自诩；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是一个阴谋家、告密者和骗子手，他无耻地克扣病人的药物，自己却保养得像一头肥猪，还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掩饰杀死病人的罪恶；督学鲁加·鲁基奇千方百计地迫害进步教师，阻挠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邮政局长施别金把拆阅别人的书信当作特别“有趣”的事，实质上是为了查获对他所维护的专制制度有妨碍的信件。他们和市长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腐朽不堪的官僚集团。而保卫这个官僚集团的社会基础，就是城里的绅士和没落的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之流。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在城里东游西荡，传播谣言。在勒索百姓、盗窃国家的资财方面，商人们和这个官僚集团也是连成一气的。尽管官僚集团的内部、官僚集团同地主、商人之间有时也奇些矛盾，但同与人民的矛盾相比，在喜剧中却退居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

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两只老鼠，“全是黑的，而且大得不得了。它们来了，到处闻一闻，就走了”。这个梦的讽喻性质在于说明真假钦差大臣都不是来惩恶扬善、申张正义的代表人物。

众所周知，引人发笑是喜剧的重要特色，误会性是构成喜剧情节的特殊手段；笑是由概念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所产生的，而误会性的情节只有当它符合事物的规律时才能使人信服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才不至于成为插科打诨的闹剧。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在这些方面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市长及其同僚们把京城来的花花公子当作“钦差大臣”，这个误会便奠定了《钦差大臣》讽刺性喜剧的基础，继而造成了浓烈的喜剧气氛和透骨的讽刺力量。

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没有塑造一个正面形象。果戈理是企图用观众的笑来严惩喜剧中的主人公的，他曾经在戏剧对话体论文《新喜剧上演后的散场》中谈及《钦差大臣》时说：“有一个正直而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他始终在剧中活动着。”“笑”就是剧中的正面人物，它代表人民对官僚集团实行的裁判。

《钦差大臣》的结构完整而朴素。市长的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戏剧的情节；宪兵的一声宣告就结束了整个戏剧；全剧的“总结”就是接待假钦差大臣，一切情节都牵连到这个“总结”上，使剧情的发展表现得极为有力、简洁、

朴素，给观众和读者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印象。

别林斯基对《钦差大臣》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艺术性最高超的范本。并且指出作家具有无穷的幽默和善于抓住性格特征的本领，从而得出结论说：“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可以希望，我们的戏剧不久将复兴，并且我们还将有自己的民族戏剧，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模仿外国式样的生硬的装腔作势，不再是借来的机智，不再是丑恶不堪的改作，而是我们生活的艺术表现。”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果戈理对沙俄官僚专制的揭露批判，并不是站在彻底推翻这一制度的革命立场上。他相信抽象的道德原则，相信只要统治者意识到不关心国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毁灭性与反动性，正义就自然会得到申张，公德就自然会得到胜利。果戈理是一个忠实的王政主义者，他并不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只反对官僚集团的腐朽与堕落。他认为恶政是从不负责任，不了解政府的要求的人们中产生的；只要把这部分人的不道德品性改变过来，官僚政治的“溃疡”也就自然痊愈了。这便是果戈理创作喜剧《钦差大臣》的政治思想基础及其局限性。可喜的是果戈理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创作中无限忠实于生活的真理，所以，喜剧的客观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主观意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长篇史诗《死魂灵》

无论是思想深度或艺术成就，《死魂灵》都称得上是果戈理的登峰造极之作。作者的批判力量、讽刺特色和爱国热情，都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钦差大臣》尚未着手写作之前，果戈理就开始进行《死魂灵》的创作了。一八三五年秋，写完《钦差大臣》之后，他几乎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这部长篇史诗的创作上。他起初构思要写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一八三五年十月十七日，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谈到这部长篇小说时写道：“我动手写《死魂灵》了，故事拉得很长，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中把全俄国显示出来，尽管是从一个侧面。”但后来果戈理因思想危机和健康恶化，于一八四二年发表第一部后，直到逝世前还只写完第二部的头几章。

《死魂灵》的第一部是一八四一年于意大利完成的。第二年，果戈理将经过四次修改的手稿带回祖国，准备正式出版。但莫斯科审查机关看出了小说“反对农奴制”的思想倾向，因而百般刁难，坚决反对出版此书。这时，别林斯基到了莫斯科，果戈理托他把《死魂灵》的手稿带到波得堡去，经过多方斡旋和在进步社会阶层的压力下，审查官尼基简柯才以删去“戈贝金大尉的故事”为条件批准出版；在一八四二年五月正式出版时，又有二十多处遭到篡改。

小说问世后，仍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甚至比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动集团的死硬分子森柯夫斯基和布尔加林等，因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阶级的丑恶本质，看到了对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农奴制度的激烈批判，因而对作者进行无耻的诽谤，并竭力证明“《死魂灵》与俄国现实毫无共同之处”。这个集团的另一一些人，诸如康斯坦丁·阿克沙科夫和谢维辽夫之流，则企图抹煞作品的批判倾向，认定其中根本没有对农奴制俄国进行讽刺暴露——二者异曲同工，其罪恶目的都是为了否定《死魂灵》的积极意义。相反，进步的社会阶层却热烈地欢迎它的出版，别林斯基对《死魂灵》给予了全面的、崇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纯粹俄国的、民族的、从人民生活深处取材的、真实而富有爱国情绪”的作品。它无情地揭开了丑恶现实的“帷幕”；在构思和写作方面，在人物性格和俄国生活的细节方面富有无穷的艺术性，“它使陷入麻木状态的现代文学苏生了”。

《死魂灵》以极其平凡的题材和人物，反映了俄罗斯的现在与未来的重大主题。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她美好前景的期望，使果戈理对“生活主人”们的猥琐和庸俗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愤懑情绪。在小说中，不仅揭露了俄国贵族地主生活的全部腐朽性和农奴制社会的反动本质，而且批判了新兴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展示了俄罗斯的光辉未来，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民族力量的坚强信念。《死魂灵》所描写的基本人物及其生活，虽说是否定的、停滞和渺小的，但果戈理却清晰地揭示了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灵深处蕴藏着无法估量的巨大潜力。因此，从构思的整体来看，《死魂灵》第一部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为了前进，为了发展人民和民族的创造性而描写否定的人物与停滞渺小的生活的。

《死魂灵》第一部共十一章，其故事情节朴实而新颖，简单而曲折，读来引人入胜，妙趣横生。

一天，省会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讲究的、软垫子的小篷车——这是中等绅士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车子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并不难看；不怎么胖，可也不显得瘦；虽说他不老，却也不怎么年轻了。他的到来，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但并没有给旅馆带来惊奇的感觉。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遇见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式的燕尾服。当他伸手按住他那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向马车看了一眼后，便走掉了。马车一进园中，就有一个活泼、勤快的侍者跳出来迎接这位绅士。侍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衣领耸得高高的，几乎埋没了脖颈，他一只手拿着抹布，将头发往后一甩，就带着这位绅士走过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上去看房间。房间是极其普通的，收价不高，一天只要花上两个卢布，就能住上一间幽静的房间。为这位绅士准备的房间里，角落上到处都有蟑螂在窥探，通到隔壁房间的门，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的邻居，是一个静悄悄、少说话，然而出格的爱管闲事的人。他对每个旅客和他们的私事，都感兴趣。旅馆的外貌并不美观：那是一排细长的楼房，楼下并没有刷白，还露着暗红的砖头，本来就不干净，经过风雨的飘洗，更显得黑沉沉了；楼上也和别处一样，刷着黄色。

当这位旅客还在观察自己住的房间时，他的行李就被搬进来了。从他那有些磨损了的皮箱看来，可见他并不是第一次外出。箱子是由他的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绥里方生得矮小，身穿一件短皮外套；彼得尔希加三十来岁，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长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鼻子，并且，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难闻的怪气味。

佣人刚刚整顿好，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一除下围巾，他就叫午膳。当伙计或侍者搬来菜饭时，他便缠住他们，向他们了解各种情况：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是不是一个流氓……侍者或伙计回答他后，他又详细地打听了这市上的知事、审判厅长和检事等人的情况。一句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有遗漏；但打听得更详细的却是这一带所有出名的地主，问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住在离市区多远的地方，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还详细地过问了本地的其他情况，比方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红斑痧、天泡疮之类……总之，他对一切问题都表现得如此关心、细致，看来并非爱管闲事，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此人，言行谨慎，生活严格遵守预计的定规和法则；连擤鼻涕也很响，每次擤，他的鼻子都像吹喇叭一样。仅此一举，就赢得了侍者们的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摇，立正，略微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什么呀？”

午膳后，这位绅士喝完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扫着呵欠。随后叫侍者领他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迷迷糊糊地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才在住宿单上写道：“五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乞乞科夫已经走出旅馆，到市场上逛荡去了。

乞乞科夫首先来到市立公园。这公园风景并不优美雅丽，只有几株刚栽下不久的树，树干上还支着漆得碧绿的三脚架。这些树儿只有芦苇。那么高，但是一家日报的“火树银花”上却标榜道：“承蒙当局之德泽，本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接着就是：“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乞乞科夫并非来这里欣赏美景，他另有图谋。在公园里，他找警察，问教会，

打听去衙门、去知事家里的便路，然后穿过市中心。一路上，他目不暇接地察看着路旁的一切，甚至还把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广告揭下，准备回旅店后再看。回到旅店，他把广告打开，秉烛细看，却没有发现什么稀奇的东西。他擦擦眼睛，小心翼翼地把广告叠起，收藏在那只白色的箱子里。据说他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总要收在这里面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这位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这知事不肥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据别人说，他不久就可以得到明星勋章了。知事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还会在绢上绣花。接着，他又访问了检事、审判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局长、市立工厂监督……连卫生监督 and 建筑技师那里，他都去表示了敬意。之后，他还久久地坐在篷车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在他的记忆中，没有访问过的官员恐怕一个也没了。在和阔人们谈话的时候，他对谁都很恭维。他称赞市里所有的官员，并且由于在谈话中故意错喊了副知事和审判厅长两回“大人”，因而知事邀请他参加家庭夜宴；其他的官员也各自接待他一番，请他吃中饭，喝茶，玩叶子牌之类。

关于自己，这位旅客避而不谈。他显得惊人的谦虚。他说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可怜虫，并没有什么令人注意的价值。为了参加知事家里的夜宴，午睡后，他在旅馆里专心致志地化了足足两个小时的妆。他盼望着黑夜早早到来。

晚上，他坐上自己的篷车，向着很阔的街道驶去。知事府里，宛如举行盛大的晚会一样，灯火辉煌，府门前还有点着明灯的车子，站着守卫的宪兵。大厅里，烛灯相映，太太们的服饰珠光宝气，乐曲的旋律，婉转动听，男女双双，翩翩起舞，婀娜多姿，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乞乞科夫还来不及细心观看，早已被知事挽着胳膊，同其他显赫人物会见去了。参加夜宴的，有生得身材矮小、但善于言辞、有哲学家风度的邮政局长；还有那精通世故、深懂人情的绅士——审判厅长，等等。他们都像欢迎老朋友那样地欢迎乞乞科夫。出乎乞乞科夫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在晚会上结识了一个姓玛尼罗夫的高雅可爱的地主和另一个姓梭巴开维支的绅士。他悄悄地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情况，问他们有多少农奴，田庄的状况如何，还问了他们的本名和父称。他了解这些情况，并非好奇，而是别有缘故的。不多工夫，他们竟交上了朋友。玛尼罗夫年纪不大，眼睛像糖一样的甜，笑起来双眼眯成一条线，他十分佩服乞乞科夫，临别时，还请乞乞科夫光临自己的村舍。外表有些鲁莽的梭巴开维支也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做客。乞乞科夫对他们恭敬地点头、握手，认为自己去赴约不但是莫大的荣幸，而且是神圣的义务。

第三天，乞乞科夫又参加了警察局长家里的夜宴。在牌场上，他结识了地主罗士特来夫。罗士特来夫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的、性格直爽的绅士，只讲几句话，就和乞乞科夫“你”“我”称呼起来了。梭巴开维支对谁都显得很亲热，最喜欢打牌，而且喜欢下很大的赌注。第四天晚上，他又在审判厅长家里做客。后来他还应邀赴副知事家、专卖局长家和检事家参加午宴；连市长都请他到家里去参加茶会。他简直没有一刻工夫的停歇，只有睡觉时，才回到旅馆里。在N市里，他成了最体面和最行时的客人。

乞乞科夫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应酬自如，每逢谈天，他总是与人们谈得很投机，他的智慧与才能，博得了官员们的赏识和赞扬。连最不喜欢说人好话的梭巴开维支，在脱衣上床睡觉时，也对他那精瘦的太太说，乞乞

科夫是“一个很好的绅士！”

但是，乞乞科夫来N市做什么？这还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乞乞科夫每天赴午宴，参加夜会，在市里过了一个多礼拜的快乐日子以后，终于决定要到市郊去访问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此行，一方面是为了赴约；另一方面还有更实在的原因和更紧要的事情。于是他吩咐马夫绥里方一早就套好马车，准备出发；跟丁彼得尔希加则留下来守着房间和箱子。一路上，过路的牧师脱下帽子同他打招呼；穿着龌龊小衫的几个野孩子一边伸手乞讨，一边喊着：“好心的老爷呀，布施点我们这些可怜的孤儿吧！”马夫并没有让任何一个想爬上车后面踏台上的人达到目的，长鞭一甩，马车便在石路上磕撞着跑远了。由于路基不平，车子又跑得快，乞乞科夫的头在车篷上重重地碰了几次。一到市郊，马路两边就出现了无味而且无聊的风景：长着苔藓的小土岗，小小的枞林，小而又低又疏的松林，枯老的石楠树干，野生的杜松……间或遇见拖得线一般长的古香古色的村落。村子里的农夫，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打着呵欠；圆脸的束胸的农妇则从窗口窥探。整个村庄显得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气。走了十五维尔斯他之后，乞乞科夫记起了玛尼罗夫的话，他的村子离这里不远了。路上，他问了两个农夫，才弄清玛尼罗夫村的地点。于是，乞乞科夫的马车顺利地朝目的地驶去。

玛尼罗夫村孤零零地坐落在高岗上，只要有风，什么地方都能被吹着。岗子的斜坡上，长满剪得整整齐齐的短草；其间还有几个种着紫丁香和黄刺槐的英国式花坛。高高的赤杨，摆动着它那带些小叶的疏疏的枝条。近处，有一座蓝色柱子、绿色平顶的圆亭，圆亭匾上有“静观堂”的字样，远处，碧草丛中有一个池子；……总之，这里风景幽美、恬静，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当乞乞科夫的篷车渐渐驶近大门的时候，玛尼罗夫穿着毛织的常礼服，站在台阶上，手搭额头当遮阳，正在研究着逐渐驶来的篷车。篷车愈近，他的神情就显得愈加快活，脸上的微笑也更甜。他终于断定来客就是盼望已久的贵客乞乞科夫，于是大叫起来：“保甫尔·伊凡诺维支！您到底还是记得我们的！”他们彼此亲密地接过吻后，玛尼罗夫便把乞乞科夫往屋里引。在客厅门口，他们站了几分钟，互相谦让，要求对方先进门去：

“请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请呀，您先请。”乞乞科夫说。

“不能的，请吧，保甫尔·伊凡诺维支，您是我的客人呀。”玛尼罗夫用手指着门，回答道。

“可是我请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请请，您不要这么费神；请请，请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能，请您原谅，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养的绅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谦让一番之后，这两位朋友终于并排走着，一起挤进客厅。

在客厅里，玛尼罗夫把太太介绍给乞乞科夫。她很漂亮，穿着淡色绢的家常礼服，非常合身；她那纤手慌忙把什么东西抛在桌子上，整好四角绣花的薄麻布头巾，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乞乞科夫愉快地在她手上吻了一吻。玛尼罗夫夫人马上对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表示对客人的光临感到无比的荣幸。他们彼此恭维着，夸奖着，在十分和谐、友好的气氛中亲切地交谈着。如果不是仆人来催他们吃饭，他们披肝沥胆的交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去吃饭时，为了让对方先进餐厅，他们又谦让了好一阵，才又并排挤入。

餐厅里，有两个孩子在等候，是玛尼罗夫的儿子，旁边站着位家庭教师。

为了讨好主人，乞乞科夫极力夸赞他们的机灵和聪颖。

饭后，乞乞科夫被主人引进一间别致的小房里，窗门正对着青葱的树林。这是玛尼罗夫的卧室。

“好一间舒适的屋子，”乞乞科夫的眼光在房里打量了一遍，说。这里确实有许多使人惬意的东西：四壁抹着半蓝半灰的无以名之的颜色；家具是四把椅子，一把靠椅和一张桌子，桌上有一本夹着书签的书，还有写过字的几张纸，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烟。那里放着他的各式各样的烟：有用纸包起来的，有装在烟盒里面的，也有散乱的就堆在桌上的。两个窗台上，各有几小堆烟斗里挖出来的烟灰，因为要排得整齐，好看，主人很费过一番心计。

“请您坐在靠椅上，”玛尼罗夫对客人说，“坐在这里舒适点。”

“请您许可，让我坐在椅子上吧！”

“请您许可，不让您坐椅子！”玛尼罗夫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说。“这靠椅是专定给客人坐的。无论您愿意不愿意——一定要您坐在这里的！”在主人的盛情请求下，乞乞科夫坐了下来。玛尼罗夫敬请客人抽烟。乞乞科夫讲了一通抽烟的害处，殷勤而惋惜地谢绝了玛尼罗夫这番美意。接着，乞乞科夫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说：“但请您许可我，要请教您一件事……”“最近一次的户口调查册，您已经送去很久了吧！”

“是的，那已经很久了，我其实也不太记得了。”

“这以后，在您这里，死过许多农奴了吧？”

“这我可不知道，这事得问一问经理。喂！来人！去叫经理来，今天他该是在这里的。”

经理立即出现了。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下巴刮得精光，身穿常礼服，看起来总像是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因为他有着又圆又胖的脸孔和黄黄的皮色及一对小眼睛。主人问他最近死了多少农奴。经理打着饱嗝儿，用手遮着嘴告诉主人死了许多，究竟死了多少，他心里也没有底。于是主人吩咐他把死者清理一下，开一张详细的名单。经理出去，玛尼罗夫问道：“为什么缘故？您喜欢知道这些呢？”乞乞科夫难为情地说：“您在问我为什么缘故么？就为了这缘故呀：我要买农奴。”玛尼罗夫认为他是要买活农奴，于是问道：“您要农奴，是连田地，还是单要他们去，就是不要田地呢？”乞乞科夫告诉他：“我要那已经……死掉的。”玛尼罗夫听了，感到十分奇怪，认为客人发疯了，他张开嘴巴，睁大眼睛望着乞乞科夫，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玛尼罗夫正在疑惑之中，乞乞科夫突然提出要立买卖合同，他更加感到惊疑了。乞乞科夫向他保证不违反民法之后，玛尼罗夫才在惊疑中勉强地与乞乞科夫达成购买“死魂灵”的协议。乞乞科夫请求玛尼罗夫把“死魂灵”的买卖合同亲自送到市里去，他要告辞了。玛尼罗夫心里非常难过，临走时。他们彼此看着泪光闪闪的眼睛，紧紧地握着手，说了一气令人作呕的客套话。乞乞科夫问明去梭巴开维支家的道路后，玛尼罗夫夫妇依依不舍地目送渐渐远去的马车，消失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看不见了，他还站在那里眺望。

马车沿着玛尼罗夫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着。由于马夫在玛尼罗夫家多喝了点酒，精神恍惚，分不清道路，又加上天黑、下大雨，因而使乞乞科夫误入另一村庄。深夜，这个村子里有一家窗户漏出一丝光亮。绥里方走去敲了敲门，不多久，门开了，里面出现一个披着睡衣的人影。乞乞科夫主仆二人又听到里面对他们嚷叫的沙沙发响的女人声：“谁敲门呀？谁在这里逛荡

呀？”

“我们是旅客，妈妈，我们在寻一个过夜的地方。”乞乞科夫说。

“是么？真莽撞！”那老婆子唠叨着，“来得这么迟。这儿不是旅店。这儿是住着一位地主太太的。”

“叫我怎么办呢？妈妈！我们迷了路了。这样的天气，我们又不能在露天过夜。”

乞乞科夫告诉老婆子自己是贵族时，她才答应“禀太太去”。进去两分钟后，她又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风灯，打开大门，让马车进去。另一个女人领乞乞科夫走进里屋。这屋子糊着旧的花条壁纸；壁上挂着几幅画，一律是花鸟，窗户之间挂着一面古香古色的镜子，昏暗的镜框上都刻着卷叶。镜子后面塞着些信札、旧纸牌、破袜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个指针盘上描花的挂钟。这些大概就是房间的全部摆设吧！再过了几分钟，主妇出现了，是一位老太太，戴着睡帽，颈子上围着一条法兰绒的领巾。这是一位小地主太太，如果收成不好，她就会悲叹颓唐。但是她喜欢悄悄地、慢慢地把现钱一个一个地弄到手，藏到抽屉里的花麻布钱包里去。一个钱包装卢布，另一个装五十戈贝克，第三个装二十五戈贝克的现款。柜子里面，除了衬衣、睡衣、线团、拆开的罩衫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假使因为过节，烤酪饼和姜饼的时候，穿的旧衣服被烧破了；或者自然穿破了；这些拆开的衣衫就要改作新的穿。如果衣服没有烧破，还可以穿的话，那些拆开的罩衫依然要躺在抽屉里。这位老太太生活是十分朴素和节俭的。她叫科罗曦契加。对客人深夜驾到无以招待表示了虚假的歉意。她安排乞乞科夫躺在一张沙发上，叫仆人菲替涅给乞乞科夫洗净烘干弄脏的衣裤。

第二天，乞乞科夫一起床就向主人打听“死魂灵”的情况。她告诉他有八十个。当乞乞科夫向她提出转让“死魂灵”一事时，这位见识浅薄的女地主感到非常惊奇，问他买“死魂灵”有什么用。乞乞科夫不愿意向她透露购买“死魂灵”的意图，只把有关留下“死魂灵”的坏处讲了一大堆，想打动这位贪财成性的地主婆的心，还表示愿意付五个卢布购买“死魂灵”，为她减轻纳税的负担和其他麻烦。地主婆科罗曦契加既怕为死去的“魂灵”交纳稅款，又担心会因出卖“死魂灵”而吃买主的大亏。她本来觉得这场交易很不坏，但却感到这太新鲜、太古怪了，何况买主是半夜三更突然到来的。所以她对乞乞科夫说：“老实说，我首先就怕会吃亏呢。你到底还是瞒着我；先生，也许他们是……，他们的价钱还要贵得远的。”

“您听我说，太太……，您在想什么呀！他们怎么会值钱；您想想看！这是废料呀！您要知道，是毫无用处的废料呀！”乞乞科夫又急又气地进行解释。

“那是一点不错的！自然什么用也没有。但使我担心的，也就是他们已经死掉了的这一点啊！”

“我的上帝，这真是一匹糊涂虫。”乞乞科夫自言自语地说。他显得无可奈何了，脸上沁出了汗珠。他拭过汗，打算用别的办法来打动她的心，于是他决定再加十卢布。可是科罗曦契加还是不愿意干，她要等别的买主来，比比价钱再卖。

“不要闹笑话。太太！您自己想想看，您在说什么了。谁会来买这东西呢。他要这做什么用呢？”

“也许凑巧可以用在家务上的呵……”老婆子反对道。但她没有把话说

定，张着嘴巴，吃惊地看着他，紧张地在等候回答。

“死人用在家务上！——我的上帝，您真的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莫非在您的菜园里，到夜里好吓雀子吗？！对不对？”

“神圣的耶稣，救救我们吧！你说着多么可怕的话呀。”老婆子边说边画十字。隔了一阵，她说：“我可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是哩。您还是不如买点麻去吧？”

这时，乞乞科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愤愤地抓起一把椅子，气势汹汹地在地板上一蹴，并且诅咒她遭到恶鬼。

说到恶鬼，地主太太怕得要命。乞乞科夫偏偏以鬼相吓。在说话时，他无意中自己是办差的，科罗疇契加才以十五卢布的价钱达成出卖“死魂灵”的协议。她对乞乞科夫说：“先生，办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如果你要徠麦呀，荞麦粉呀，压碎麦子呀，或是肉类的话。”

“不会不会，太太，我再也不会忘记你了的。”他一面用手擦汗，一面说。

交易办妥了，科罗疇契加摆出了丰盛的宴席，请乞乞科夫吃饭。桌上摆满着许多美味的食品：有香菇，有烙饼，有蛋糕，有蒸饼，有酪条，有脆饼和烘糕，以及各式各样的包子：大葱包子，芥末包子，凝乳包子，白鱼包子，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主人招待客人的态度是殷勤的，没有半点虚心假意。美餐之后，乞乞科夫辞别女主人，准备上大路去找梭巴开维支。主妇考虑到路上拐弯处较多，担心客人迷路，于是叫一个小女孩给他们带路，可是这个小女仆连左右也辨不清。

马车继续前进着，到了一家客店，乞乞科夫叫马夫停车休息。在这里他意外地碰上了地主罗士特来夫；他们曾在检事家里一同吃过饭。一见面，罗士特来夫猛然张开双臂，大喊起来：“什么引你到这里来的？”不等乞乞科夫回答，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在城里打牌而弄得精光的事情。他不以输得精光而感到惋惜，反而津津乐道地向别人夸耀，真是奇怪极了。他还吹嘘自己喝了许多上等酒，甚至中午一餐，就灌了“十七瓶”。接着他又邀请客人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乞乞科夫应邀前往。

不仅狂热的欢乐、酒后的放荡、粗野的殴斗和紧张的赌博是罗士特来夫的终生嗜好，而且吹牛撒谎成了他的天性。尽管他的家业本已破败萧条，但一进屋就对客人大肆吹嘘。他的撒谎与赫列斯达可夫（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不同，赫列斯达可夫的撒谎是在特殊的形势下逼出来的，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并且是以攫取特权的幻想为其动力的；罗士特来夫的撒谎则是从他的天性中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的，是他天性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撒谎不仅荒谬绝伦，甚至是没有意识和没有目的。他家里一匹极为平凡的栗色雄马，本来值不了几个钱，他硬赌咒发誓地说花了一万卢布买来的；池子里是否有鱼还很难预料，罗士特来夫却用手势比划着说，里面“有着这么大的鱼，倘要拉它上来，至少也得用两条大汉”；一条克里米亚母狗，已经瞎了眼睛，而且很快就要死了，他也要吹嘘一番，说两年前却还是一条很出色的母狗；还说他的田野里兔子多得连地面都遮满看不见了，甚至自己用手抓住过一只兔子的后脚；又说他的地租很多，边界线很远，还煞有介事地带着乞乞科夫去察看边界线……他撒起谎来不加思索，不打腹稿，不厌其烦，不问场所，不顾后果；对罗士特来夫来说，撒谎本身就是他性格的一种自然形态，就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罗士特来夫为客人准备的中餐，菜的花样虽说不多，但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名酒：有葡萄酒，有玛兑拉酒，还有香槟和蒲尔戈浓的综合酒，还有乌梅烧酒，有香醪酒，还有一种名字不容易记清的酒。许多酒乞乞科夫不仅没有喝过，连名字也没有听过。

饭后，罗士特来夫赌瘾复发了。“来一下小玩意吧，朋友！”罗士特来夫边说，边把纸牌从套子里抽出来，“消遣消遣呀，你知道，我想玩一下三百卢布的彭吉式加！”

乞乞科夫假装没有听见，却自己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道：“哦，几乎忘记了，我要和你商量一点事！”于是，他们的话题陡然转到购买“死魂灵”上面来了。这个新奇的玩艺儿引起了罗士特来夫极大的兴趣，他立即问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用意何在。乞乞科夫不愿意告诉他。罗士特来夫毫不退让地说：“很好，随你说吧。在你没有告诉我之前，我不答应！”而乞乞科夫却对罗士特来夫撒了个谎。开始说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名望”，“随后又说是结婚的需要。然而狡猾的罗士特来夫知道这是谎言，骂乞乞科夫是个大骗子，不同意将“死魂灵”卖给他；倘若要做生意，可以让乞乞科夫买点别的东西去，例如那匹值钱的母马等等。乞乞科夫拒绝了这种交易，罗士特来夫便要客人买几要狗去，不然就花上九百卢布买他那价值一千卢布的摇琴。他说：“我给你摇琴，再加上所有的‘死魂灵’，你就留下你的篷车，还只要再付三百卢布。”乞乞科夫当然不会要那些东西。为了这些交易，两人居然争吵了起来，罗士特来夫甚至下令仆人不给乞乞科夫的马喂燕麦。

罗士特来夫有一个这样的习性，无论和谁吵得再凶，甚至打起架来，隔一会就没有事了。和别人打骂之后，很快就同对方恢复了原来的关系，甚至比过去更加亲热。第二天一早，罗士特来夫便与乞乞科夫友好了，如同没有吵过架一般。他向客人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显得亲热极了；早餐仍然恢复了昨天中餐的丰盛状况。为了弄到他家的“死魂灵”名单，乞乞科夫不忍离开他家。罗士特来夫提议用赌博或下棋的输赢来处理这批交易，乞乞科夫答应同他下棋。下棋时，罗士特来夫偷偷地把自己的棋子移动了，被乞乞科夫发觉。因此，他们停止了下棋，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可惹怒了罗士特来夫，他那双喜欢打架的手挥动着，要打乞乞科夫。乞乞科夫两手紧紧地捏住罗士特来夫的手。罗士特来夫发疯似地喊家丁厮打乞乞科夫。乞乞科夫走投无路了，眼看要遭一顿毒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地法院院长坐着马车朝罗士特来夫家驰来，有么事找他，乞乞科夫才趁机逃脱；抓起自己的帽子，溜出了罗士特来夫家，坐上仆人早已套好了的马车，全速逃跑了。

车子已经离罗士特来夫村很远了，但乞乞科夫还呼吸沉重，心在突突地跳动。他咬牙切齿地诅咒罗士特来夫祖宗三代，子子孙孙。这时，他的对面来了一辆六匹马拉的车子，里面坐着一位年轻而漂亮的金发女郎。她那非常漂亮的脸庞圆得像一个嫩鸡蛋，闪着雪白、透明的光；她那娇嫩的耳朵在温热的太阳光照耀下，微微地颤动着。她的脸上显出了受惊的表情。由于双方没有让好路，两部车子碰搅在一起，双方发生了冲突。最后还是当地的农民把两辆马车推开。

乞乞科夫的马车依然在大道上正常地前进着；他的头脑中出现了闲暇的思维。他认为那金发女郎确实漂亮，但自己身负重任，并无意追求她，即使要追求也是以后的事情。他偶一抬头，梭巴开维支的村庄已经清楚可见了。于是，他的思绪从闲暇中又转到迫在眉睫的事情上去了。

梭巴开维支的村子很大，两边围满了茂密的白桦和黑松，像是一对翅膀。中间是一所木房子，红色的屋顶，暗灰色的——实在是粗糙的墙壁——就像造给屯田兵和德国移民的房屋一样。主人为了便利，把墙壁上一切通气的窗户都堵塞了，只留一个小小的圆孔透气。房间里的光线当然很暗。

当马车停在阶沿前面时，看见了一男一女。那两个人在窗口一瞥之后，又消失了。随后一个家丁到阶沿迎接乞乞科夫。客人才进大门，主人早就在那里等候了。他一见客人，只简短地道了一声“请”，就把他引进客厅去了。梭巴开维支指着一把椅子，又说了一声“请”，乞乞科夫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眼睛便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

乞乞科夫觉得，梭巴开维支的外形、举动，甚至内心世界无不与熊相似——笨拙、贪食而残忍。他的存在使人感到一种威胁。他的身体与生活使人觉得一切“无不坚固，而且岿然屹立在地面上”，似乎深沉不可动摇，连他房间里的陈设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他的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希腊的将军们”的画图，“这些英雄们，都是非常强壮的腰身，非常浓密的胡子，多看一会，就会令人吓得身上发生鸡皮皱”。和男英雄们并挂着的是“希腊的女英雄：罗培里娜，单是一条腿，就比现在挂在客厅里的无论哪一位阔少的全身还要粗”。他房间里的家具：桌子、椅子、胡桃木写字台等，也都像主人本身一样，无不“笨重、坚实”，“全都带有一种沉重而又不安的性质”，每样东西，每把椅子，似乎都在说：“我也是个梭巴开维支！”“我也像梭巴开维支！”

主客二人都默默地坐着。不一会，房门开了，一位又高又大的太太，头戴缀着自家染色的带子的头巾，走了进来。梭巴开维支告诉客人这是他的太太。太太向客人淡淡地打个招呼以后，坐在沙发上，眼睛和眉毛一动也不动了。房子里又沉默了一阵。为了打破沉闷的空气，乞乞科夫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提起往事，赞扬知事等市里的官员，梭巴开维支却破口大骂审判厅长是世上无双的驴子，知事是强盗，警察局长是骗子……一句话，市里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好人。因此，乞乞科夫悟出一条道理：梭巴开维支是不喜欢说人们一点好处的。他感到无味极了。

但梭巴开维支招待客人却是真心实意的。采“如果是烧猪或烧鹅，那就拿出一只全猪或全鹅来。”吃饭宁可只要两样菜，不过要给客人吃一个饱，直到对方满意为止。中餐招待客人的烧鸡或烧鹅等菜，不仅味道鲜美，而且真的都是全的，肚子里还装着各种香甜可口、营养价值颇高的东西。乞乞科夫饱餐了一顿，梭巴开维支则胀得出气不赢。在吃饭时，乞乞科夫从主人嘴里得到了一个新“情报”：地主泼留希金家产很大，魂灵众多，“死魂灵”也不少。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去拜访泼留希金，做一批大生意。

乞乞科夫当然不会忘记来梭巴开维支家的使命。他拐弯抹角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再转到“死魂灵”这个课题上来。他问梭巴开维支家有多少“不在的”农奴。

“那是有的，有的是！怎么会没有呢？”梭巴开维支说。

“唔，是吧？您既然有，那么，您一定是很愿意脱手的罢？”

“可以，我是很愿意卖给您的。”梭巴开维支把头一抬说。他似乎已经看穿这买主是要去赚一笔大钱的了。

“那么，可否问一下，您要卖多少呢？虽然……这样的货色……也很难定出价钱来。……”

“那么克己一点：每只一百卢布罢。”校巴开维支说。

“一百卢布！”乞乞科夫吃惊地叫了起来，他张大嘴巴望着梭巴开维支。停了一阵子，他还价道：“干干脆脆。我说，八十戈贝克——这是最高价了。”

梭巴开维支哪里会肯同意呢？他向乞乞科夫滔滔不绝地介绍死去的魂灵生前的本领和重大作用，一句话，他要把死人当作活人卖给买主，他们在讨价还价，互有添减。最后终于以每个“死魂灵”两个半卢布达成了交易。梭巴开维支造好册子，交给乞乞科夫。乞乞科夫略微一看，感到非常惊奇。他发现册子造得十分完备和仔细，不仅那职务、手艺、年龄和家景都写得很周到，册边上还附有备考，记着经历、品行之类。总而言之，在乞乞科夫看来，看这册子，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乞乞科夫付了二十五卢布定钱之后，问明去泼留希金家的路线，寸离开梭巴开维支家。但心里有些愤愤然。车子一出庄，便往泼留希金家进发。

马车到了泼留希金的庄园。看来这庄园主先前家业很大，现在却显得荒凉破败了。房屋显得寒伧，墙壁和门上，满生着青苔。前园里有堆房、仓屋、下房等，彼此挤得很紧——而且分明带着陈旧倒败的景象；左右各有一道门，通到别的园子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给这种悲哀的景象增添一点快活的气氛，既没有敞开的门窗，也没有往来的行人，更没有活泼愉快的生活气息……一切都使人感到阴森沉闷，透不过气来。

在一所房子前面，乞乞科夫发现了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影。他开始断定是一个女的，便说道：“请问，妈妈，主人在做什么呀？”“女人”告诉他，主人并不在家，请他到里面去。乞乞科夫看到“她”的背上沾满了面粉，衣衫上有几个大窟窿。走进里屋后，他才发现那“女人”原来就是男主人，感到十分惊讶。在乞乞科夫看来，从泼留希金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和普通的瘦削的老头子比是不大有什么两样的；“……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马桶刷似的胡须，看看是否藏着猫儿或者顽皮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他的穿着更加褴褛不堪：他的睡衣分辨不清是什么底子；袖子和领子都非常齜齜，油光锃亮，好像做长靴的郁赫皮；背后的衣裙拖着四片布，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颈子上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不知是旧袜子，是破腰带还是绷带。如果是在别处，乞乞科夫说不定还会给他施舍两个戈贝克。

积储财物，是泼留希金惟一的生活目的和最大的人生乐趣。他的全部精力和思想感情都集中在积储财物的事情上。他家拥有一千以上的农奴和堆积如山的财物，堆房、仓库和地窖里堆满了“几代也使用不完的”东西，米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肥堆，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棉、麻、毛织品已经化成了灰，但他还感到不满足。在一种无止境的占有物质欲望的支配下，他每天跑到庄园外面去寻找物品，东张西望，看看路上、桥下能否捞到一点什么东西，哪怕是碰见“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服，一个铁钉，一片碎瓦”，他都要捡回家去储藏起来。积财的强烈欲望，使泼留希金采用各种克制办法，不仅不让自己过正常的生活（吃的半饱半饥，穿的破破烂烂，住的陈旧简陋），将开支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拒绝和别人交往，以免招待客人耗费自己的财物，影响财富的积储。他不但拒绝一切社交活动，而且六亲不认，扼杀父子感情，抛弃天伦之乐，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据说儿子进联队当了军官后给他寄来一封信，想向他要点钱做套像样的衣服，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大

女儿带着自己的小儿子两次看望父亲，想从父亲这里“弄点什么去”，泼留希金除了拿起一颗放在桌子上的小扣子送给小外孙做玩具外，便一毛不拔了。另一回，女儿带着两个儿子同来，还带了一些牛奶面包和一件崭新的睡衣送给父亲，泼留希金感激地收下了这些礼物，但他除了让两个外孙分坐在自己的左右两腿上、颠起来玩“使他们好像在骑马”之外，就再没有任何表示了，女儿只好又空着双手回去。泼留希金就是一个这样的吝啬鬼！

乞乞科夫走进里屋后，和主人默默地站着，已经有好几分钟了，泼留希金才开口请乞乞科夫就坐。一攀谈就装穷叫苦，他说：“我只有一点点田地，农奴又懒，不喜欢做工，总只记挂着个酒店……”接着他又告诉客人：那该死的热病，使他的农奴“整批整批的死掉了，至少有一百二十个”。乞乞科夫听到这个数字，既吃惊不小，又非常高兴。他在假惺惺地表示惋惜同情之后，又立即表示自己情愿尽极大的义务，替泼留希金负担死农奴的人头税。这个提议，使泼留希金感到太意外了。他异常激动地对乞乞科夫说：“您对一个苦老头子做着好事哩！唉唉，你这我的上帝，你这我的救主！”

“您看这怎样？”乞乞科夫以救世主和恩人的姿态对泼留希金说：“我们要做得简便：我们彼此立一个买卖合同，像他们还是活着的似的，您把他们卖给了我。”并且乞乞科夫还说连买卖合同的费用全归自己负担。

泼留希金误认为乞乞科夫是一个大恩人，决心破例地招待他一番。先叫泼罗式加去烧菜，接着亲自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柜子，在瓶子和碟子之间找寻了好久，终于叫了起来：“现在找到了，我还有一瓶很好的果子酒在这里；如果那一伙没有喝掉的话！那些东西实在是强盗。哦，在这里了！”乞乞科夫看见他两手捧着一个满是灰尘的小瓶，并唠叨不休地告诉乞乞科夫：“这还是我的亡妻做的呢。”“那女管家，那坏东西，就把它放在这里，再也不管，总不肯塞起来，那坏货！上帝知道，多少蛆虫和苍蝇和别的灰尘都掉进去了，但我已经统统捞出，现在又很干净了，我想敬您一杯子。”面临这种情景，乞乞科夫委婉地谢绝了。

对乞乞科夫来说，最主要的是把这批为数可观的“死魂灵”弄到手。一个急需买，一个急需卖，当然会一拍即合。经过协商，结果以每个三十戈贝克的价格，购买了七十八个“死魂灵”。泼留希金没工夫进城去签办手续，只写一封信给审判厅长，要他代办。信由乞乞科夫带去。乞乞科夫拿到“死魂灵”名单，开水都没有喝一怀，就匆匆地离开了泼留希金家。

经过一番辛苦的、不无周折的走访之后，胜利地完成了购买“死魂灵”的任务，乞乞科夫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回到N市的旅馆里。

连日来的奔波劳碌，使乞乞科夫感到极度疲劳。回到旅馆，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早醒来时，便想到了自己拥有的将近四百个“死魂灵”，心中觉得如蜜一样的甜。他从床上弹了起来，披好衣服，亲自起草了注册呈文。两个钟头以后，呈文和名册都誊写清楚了。当他重新拿起名单来细看时，他便仿佛觉得每个农奴都具有自己固有的特征：属于科罗蟠契加的农奴，谁都带有一个什么译名；泼留希金的名单却显出文体之简洁，往往只写着本名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底下是点两点；梭巴开维支的目录，则以他的出格的详细和完备令人惊奇，连每个农奴的极细微的特性，也无一疏漏；……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新鲜之感，令人觉得这些农奴们，仿佛昨天还活着似的。面临这批“死魂灵”的名单，乞乞科夫想象着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及技能习性。忽然在名单上发现：梭巴开维支把一个女农奴混入了里面，于是他不加

思索地在册子上圈去了那个女性农奴的名字。

中午十二点，乞乞科夫换好衣裤，洒上香水，挟着文件，到民事法厅办理买卖合同去了。

在大街上，他又碰上了玛尼罗夫。两个老朋友热情地拥抱和接吻，足足有五分钟之久，以至门牙几乎痛了一天；紧接着又握了十五分钟的手。他们边谈边走，互相搀扶着，上了办公楼。

在办公楼上，乞乞科夫先遇上两个年轻的官员，又找到了契约科的伊凡·安敦诺维支，官员们的傲慢态度，使乞乞科夫大伤脑筋。他们根本就不理乞乞科夫。当乞乞科夫拿出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并说明自己也是官员之后，伊凡·安敦诺维支才对他客气起来，并告诉他审判厅长会派专人处理此案，还派了十四等官把乞乞科夫引进厅长办公室。

威严的厅长，像太阳神一样坐在一张宽阔的靠椅上，他身旁还有梭巴开维支陪伴。乞乞科夫的到来，使在场的人发出几声欢呼，厅长的椅子格格作响，被推到一边去了。梭巴开维支也站起来，拖着他的长袖子，恭恭敬敬地立在地上。厅长和乞乞科夫拥抱着，办公室里又响起了一阵接吻声。他们彼此问好后，厅长亲自为客人的置产伟业道贺。

在厅长、检事等官员的大力协助下，乞乞科夫迅速地办妥了“死魂灵”的买卖手续。契约科伊凡·安敦诺维支对乞乞科夫说：“您买了十万卢布的农奴，我效了力，却只有一张白钞票（二十五卢布）。”乞乞科夫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他的索取。

警察局长得知此事以后，大摆宴席为乞乞科夫庆功。宴席上，酒怀碰得叮当响，甜言蜜语满天飞，有人甚至说要给他找一个漂亮太太。乞乞科夫得意忘形，早已喝得酩酊大醉，回到旅馆后说了许多胡话，便沉沉地入睡了。马夫与跟丁趁机溜进酒店，也痛饮狂欢一番。

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一事，已经成为市镇街头巷尾谈话的中心。人们交谈着，争辩着，研究着购买农奴的利弊，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时众说纷纭，闹得满城风雨，甚至闹出了许多笑话。有许多人为乞乞科夫把农奴转移到南方而担心。有的说：“南省的土地，又好又肥，那是不消说的；但没有家，可叫乞乞科夫的农奴怎么办呢？那地方是没有河的呀。”有的说：“他搬到新地方去种地——那地方可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屋，也没有庄园——他（指农奴——引者）是要跑掉的。”他们最怕那些农奴造反。这些议论间接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民的觉醒和力量的壮大以及统治阶级的最大担心。同时，人们的议论，给乞乞科夫招来了极大的声誉。人们把他当作百万富翁，对他恭维备至，并深情地挽留他多住一个星期。N市的闺秀们也不甘落后，人人都在这个“百万富翁”面前献媚争宠。乞乞科夫甚至还接到一位闺秀的求爱信，要他离开都市，跟她一同到荒野去。信的结尾是一首诗：“两匹斑鸠儿，载君到坟头，彼辈鸣且歌，示君吾深忧。”诗中流露出绝望的感情。这是一封没有署名、没有落年月日的信，是谁寄来的，一直是个谜。

一天，知事发来表帖，邀乞乞科夫参加舞会。他一走进舞厅，就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在场的人都无比亲热地向他打招呼，争先恐后地同他拥抱。乞乞科夫还没有从审判厅长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警察局长就已经把他围在自己的臂膀里了，警察局长又交给卫生监督，卫生监督又交给烧酒专卖局长，烧酒专卖局长又交给建筑技师……那知事正和一对闺秀站在一起，一只手拿

一张糖果的包纸，另一只手抱一条波罗举那的小狗，一看见乞乞科夫，就把手中的东西抛到地板上，摔得小狗大声地嗥起来……总而言之，乞乞科夫给会场带来了快活的气氛。闺秀们浓装艳服，香气扑鼻，围绕乞乞科夫转来转去，使他非常狼狈。乞乞科夫极力想辨别出谁是发信人，但从闺秀们的装束、姿态和表情上看来，似乎个个都像。他有些气馁了。

知事太太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在乞乞科夫面前出现了。那姑娘有着明亮的全发，秀丽端庄的相貌，尖尖的下巴和卵圆型的脸盘，非常漂亮。她的出现，使乞乞科夫的心田荡起一层涟漪。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女郎身上，而置其他的闺秀们于不顾。但闺秀们却不肯轻易放过他。她们各自下定决心，使出自己最拿手的一招来博得乞乞科夫的欢心与宠爱：她们卖弄风情，都想用优美的舞姿、醉人的身段和华美的服饰打动乞乞科夫的心。乞乞科夫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心在寻找知事的金发女郎：陪她同坐，与她攀谈。乞乞科夫的行动，引起了闺秀们极大的不满。但乞乞科夫却沉醉在良辰美景的幻梦之中。

可是，好景不长，正当乞乞科夫与金发女郎谈得起劲的时候，说谎专家罗士特来夫在舞会上出现了。他在舞会上大肆宣扬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机密，使乞乞科夫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然而好在人人都知道罗士特来夫的撒谎性格，不相信他的话。并且把他赶出了舞会；乞乞科夫才从极度困惑和苦恼中解脱出来。

乞乞科夫为一种忧郁的思想苦恼着，回到旅馆，没有半点睡意。他担心购买“死魂灵”的秘密会被暴露，心神烦闷已极。就在这天深夜，远处的大街和小巷里，轧轧地走着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既不像客车，也不陈篷车，其实应该算是一辆马车。这辆车穿过无数条大街小巷后，终于在住持太太的门口停下了。车子里爬出一个姑娘，头戴包帕，身穿背心，捏起两个拳头，像男人似地使劲捶门。门开了，车子里又走出一位太太。这就是女地主科罗蟠契加。乞乞科夫一离开她家，她就非常着急，恐怕自己遭了他的骗，以至三天三夜不能睡觉。于是她下定决心，虽然马匹还未钉好马掌，也一定要亲赴市镇，探听一下“死魂灵”是什么时价；她这么便宜地卖掉许多“死魂灵”，是否上了大当。科罗蟠契加的到来，究竟给乞乞科夫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天早晨，从一家蓝柱子、黄楼房的大门里，出来一位穿着豪华的花边衣服的闺秀，前面是一个家丁。她身穿缀着许多层领子的外套，头戴金色锦绦的圆帽，急急忙忙跳下阶沿，向车夫喝一声“走”，便坐着马车外出了。她刚刚知道一件重要新闻，正要去告诉别人。这位被称为“也还漂亮的太太”，刚走进一家房门，就受到了另一个闺秀的热情迎接。因她长得特别美，所以人们管她叫“通体漂亮的太太”，她们一见面，首先谈衣饰的式样，接着谈男人，继而讲到在住持太太家发生的故事。——“也还漂亮的太太”对“通体漂亮的太太”说：住持太太告诉她，昨晚女地主科罗蟠契加深夜跑进她家里，向她透露了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一事，问她“死魂灵”的时价。“通体漂亮的太太”不理解“死魂灵”是怎么回事。“也还漂亮的太太”向她作了解释。“通体漂亮的太太”作出结论说：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是一个假托，其实是想“拐诱知事的女儿。”……

人言可畏，在市镇上很快地流传着乞乞科夫购卖“死魂灵”的新闻。此外，还流传着他拐骗知事的女儿的新闻，这些消息像旋风一样吹遍了整个沉睡着的市镇。乞乞科夫的声誉和地位每况愈下；来旅馆里探望拜访的人渐渐

少了，朋友们都与他断绝了关系。

随后，更多的谣言在市镇上传开了：有的说乞乞科夫是拿破仑化装隐藏在俄国的特务；有的说乞乞科夫伪造钞票；也有的说他是强盗；……总之，他遭受着莫大的冤屈。知事、审判厅长等官僚，原来都是乞乞科夫的至爱亲朋，现在也对他持怀疑态度；检事被惊人的谣传所吓死。

真是祸不单行。乞乞科夫近几天又受了点寒，不曾出门。几天以后，他的病虽然好了，但朋友们已完全停止来访，使他感到非常苦恼；他决定亲自登门走访。由于他留恋漂亮的金发女郎，因此他首先拜访知事家。但他吃了一个闭门羹，因为知事和太太被恼人的谣传吓怕了，吩咐守门人再也不准乞乞科夫进屋来。乞乞科夫在知事门前站了一阵，无可奈何地去拜访别的官员，但都遭到了类似的“接待”。他找熟人询问其中的缘故，但谁也没有照直告诉他。他非常纳闷，在街市上徘徊一阵之后，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回到旅馆里。还是罗士特来夫把市镇上的一切谣传转告了乞乞科夫，他才恍然大悟：自己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人们也许会问，乞乞科夫是个什么人？他购买“死魂灵”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向我们揭开了谜底：

原来，乞乞科夫出生于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送他上学时教导他说：“只要和你的上头弄好，那么，即使你生来没有才能，学问不大长进，也都不打紧；你会赛过你所有的同学的。不要多交朋友，他们不会给你多大好处的；如果要交，那就拣一拣，要拣有钱有势的来做朋友，好帮帮你的忙，这才有用处……但顶要紧的是：省钱、积钱，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这却不能不要的。朋友和伙伴会欺骗你，你倒运，首先抛弃你的是他们，但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即使遭了艰难或危险，只要有钱，你想怎样就怎样，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成。”父亲的这些临别赠言，成了他生活的座右铭和行动的指南。他在人海的漂游中，把这些教诲当作生活守则和奋斗目标，时时牢记心间，并始终不渝地身体力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急流险滩和惊涛骇浪，也从未犹豫动摇。他承袭父传的衣钵走入社会，凭着它，首先使衙门里的旧官员上了当。后来他当上了财政厅的职员。为了要做科长，他不惜追求上司的其貌不扬的女儿，等到科长的头衔一到手，就若无其事，退避三舍。由于他坚定不移地抱着发财致富，出人头地的奋斗目标，又有一种克服任何困难阻力的魄力，再加上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的社会手段，所以他能够从一个每月三十四卢布薪金的小职员，逐渐沿着行政的阶梯爬上了在短时内能捞到一笔巨款的“肥缺”。他贪污的行径被人揭发后，非分之财顷刻化为乌有。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放弃既定的目标。他像一只饥饿的豺狼寻找食物一样，贪婪地追求财富，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哪怕是伤风败俗，冒险投机也在所不惜。在饱经人间风霜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贩卖“死魂灵”是一种本小利大的交易。他以低价收购一批尚未销除户口的“死魂灵”，再把他们作活农奴向政府取得证明，以便南迁，尔后他便可以享受地主的一切权利，以优待的办法在南俄得到土地。得到土地后，也就打算再把它们高价转卖出去，通过买空卖空的手段捞进一笔横财。因此，他不辞辛苦、不顾后果地断然从事，驱马驾车，奔赴农村，一家一户地去探询拜访，将自己的全部本领和社交经验都使用了上来，让他的商业“天才”获得了充分的发挥。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黄粱美梦终于彻底破产了！

果戈理别具心裁地以乞乞科夫作为“导游者”，把人们带进了沙俄这个黑暗王国的后院，使人们对农奴制俄国的种种弊病一目了然。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地主形象，他们以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构成了农奴制社会最本质的方面。

玛尼罗夫是乞乞科夫第一个拜访的庄园主。他貌似文明高雅，实则庸俗不堪。你同他初次见面，谁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可爱而出色的人”，但稍停一会儿，你“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再过一会，便会在心里想到：“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于是你就会厌恶地离开他，否则，“那就立刻觉得无聊得要命”。他头脑空虚，懒惰异常，不辨禾麦，爱好幻想，对待任何问题都毫无主见，束手无策。他不但看不出乞乞科夫的欺骗手段，反而对他顶礼膜拜。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同常见的地主和花花公子一样，他外表上的热情迸发和彬彬有礼，只不过是掩饰他心灵空虚的一块稀薄的纱布。他的言谈、神态和举动，无不表露出多情善感，游手游闲，惯于梦想的性格特征。他虽然还能与外界保持一点点联系，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变态形式而已，没有丝毫值得肯定的价值。

如果说，在玛尼罗夫的身上还没有明显地看到地主阶级走向死亡的规律的话，那么，我们在科罗蟠契加身上便看到了他们正在走向灭亡。她是一个死板愚蠢、吝啬贪婪的务实主义者，她为人庸俗肤浅和畸形发展的精神面貌，都是以自然的状态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而不像玛尼罗夫那样用一种绅士的“高雅风度，作外衣将内心的东西掩饰起来。她终年守着一大堆家产（包括作为家产一部分的农奴）。逢人便问是不是来收买她的蜂蜜和大麻的。她已经开始与世隔离。对外界极为生疏，以致当她看到乞乞科夫的那口在城里人看来平常得很的小提箱时，也感到格外新奇。她把经营田产家务和积储钱财当作自己神圣的天职。她的思想已经麻木、迂腐了。她固守着死水一潭的生活方式，决不改变。这种生活使她形成了愚蠢、迷信、古怪和胆怯的性格。这是尼古拉一世时代庄园地主又一典型人物，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宗法社会的过去。

罗士特来夫是由农奴制度所豢养、受着专制政权的保护而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的乡绅恶棍的典型，被鲁迅称作“地方恶少式的地主”。声色犬马、吃喝玩乐、造谣惑众、为非作歹一概俱全。他善交际，好吹牛，说起话来天花乱坠；爱游荡、喜玩乐、好捣乱、善欺诈，毫无顾忌地耍无赖。他外表上的坦白、直爽和“确实的英勇”，深刻广泛地概括了乡绅和沙俄官僚集团寡廉鲜耻、毫无顾忌的反人民的本质特征。

与玛尼罗夫、科罗蟠契加、罗士特来夫等不同，梭巴开维支是一个精明强干，头脑清醒的地主。他外表像熊，给人一种可怕的威胁力量，待人接物极为自私刻薄，但却自奉宽厚。他遇事三思，没有玛尼罗夫那么懒散和糊涂；深通世故，不像科罗蟠契加那样愚笨和保守；出言谨慎，又善理庄园，没有罗士特来夫那样莽撞粗暴和无能。正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长于其他地主，故能很快地识破乞乞科夫的诡计，并且采用一切方法与乞乞科夫斗智。梭巴开维支的精明能干，完全是庄园地主那种自私、贪婪和残忍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他把别人都看作头号的强盗、骗子、恶棍和坏蛋。如果有什么新鲜事物妨碍了他的陈规旧习和生活方式，他便极端仇视，恨之入骨，最终成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死敌。梭巴开维支虽然与玛尼罗夫、科罗蟠契加和罗士特来夫同是沙俄农奴专制这根藤上的黑瓜，但前

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大地主泼留希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于病态的守财奴和吸血鬼。他的庞大的庄园日见凋敝，甚至濒于破落，农奴大批地死亡或逃跑，但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他既是一个凶狠毒辣的吸血鬼，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吝啬狂；人性的毁灭在他身上达到了极点。我们从泼留希金极度吝啬却又逐渐破产的这段历史中，清楚地看到：封建农奴制本身已经在给自己挖掘坟墓了。这就是泼留希金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所在。

乞乞科夫是一个新兴的剥削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死魂灵》中，他是贯穿作品始终的重要形象，他的活动，构成全书情节的枢纽。果戈理赋予乞乞科夫的形象以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他引导读者巡视农奴制社会各个肮脏的角落，另一方面又通过他显示出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和资本主义因素已在封建专制的母体内开始孕育成长的实况。作者对这个新“怪物”的出现，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乞乞科夫最大的特点是：随机应变，投机取巧，面向现实，专心致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在购买“死魂灵”而和人们发生的一切关系里全都渗透着极端利己主义的冰水。他的言谈举止，无不受发财致富的目的所支配，他在捞取钱财的旋途中，表现了极大的顽强性、坚定性和务实精神，与玛尼罗夫等地主相比，具有明显的发展潜力；但当他偶然涉及到人类具有真正价值的感情领域时，就表现得苍白无力了，同他对追求物质利益的态度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正是在这两种心理差异的比较中，果戈理深刻地揭示了商业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

官吏们的形象，在《死魂灵》中也是富于表现力的。但他们与地主以及乞乞科夫的形象不同，作者没有对他们单个地加以充分描写，而是作为官僚统治者群像来塑造的。作者没有重复《钦差大臣》中的那些形象，而对外省官吏集团从新的角度进行处理，主要揭示他们与庄园地主阶级的密切联系，与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对国家事业的不负责任，以及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恶劣作风。这些人对社会的发展有害无益，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只能起绊脚石的作用。

《死魂灵》不仅是一部用生花妙笔写成的沙俄农奴制的病征史，它还让人们在农奴主、封建官吏和资产阶级市侩这些奇形怪物的后面，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人民和前途远大的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主题，是贯穿在《死魂灵》第一部中的潜流。小说许多地方都使读者明显地感受到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对农奴制的自发反抗。如人们对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担心；一些农奴因经受不起农奴主和官僚专制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或逃进森林当强盗，或逃到城市里当雇佣，或把虐待他们的警官打死……总之，广大劳动人民当中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反抗农奴制黑暗社会的力量。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一方面表现了农奴的不满和反抗是农奴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他们渴望自由，追求做人的权力是无可非议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农奴们以暴力行动来惩治农奴专制政权的代表者，对农奴的起义和暴动作了消极的评价，他觉得这太凶恶太可怕了，由此可见果戈理世界观的复杂性、矛盾性和阶级局限性。

《死魂灵》是果戈理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它以朴素的情节结构和“十足真实”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在小说中，作者还运用奇特的夸张、生动的比喻、逻辑上的异变以及反语、双关语和俏皮话等表

现手法，构成了独创的幽默讽刺特色。在塑造人物时，作者善于抓住同人物性格有内在联系的外貌特征，加以突出的描摹，既能使人物的外貌浮雕般地刻印在读者的头脑里，又使其成为通向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再加上以富于个性化的语言的点染，就使人物呼之欲出，跃

然纸上，栩栩如生。小说中许多议论、抒情的穿插，与形象描写的部分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形成一种虚实糅合、含露交融和情理渗透的独特气派。

独特的艺术风格

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成为反映特定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一直为后世所传诵，这是由于它不但具有超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作品，在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描写的真实性，喜剧性的讽刺手法，浮雕般的肖像描绘，以及个性化的语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显现出了果戈理惊人的艺术天才。

一、十足的生活真实

生活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的创作中，其程度又是千差万别的。这种艺术与生活密切结合的趋向，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到十九世纪的果戈理时期，又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果戈理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使俄罗斯文学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性、独创性和“十足的生活真实”（别林斯基语）。果戈理的全部创作，从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到晚期的长篇名著《死魂灵》，无不给人一种题材平凡，构思朴素，描述自然，形象逼真，意境优美，情节新颖的感觉。其中取材现实，揭露沙俄黑暗的农奴制的作品，固然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没落衰朽、卑微庸俗的生活真实；就是那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充满着浪漫主义奇异色彩的作品，也不乏俄罗斯人民风土人情的生活气息。

凡是读过《索罗庆采市集》的人，恐怕谁也不会忘记开篇所描绘的那幅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令人陶醉神往的乌克兰乡村的初夏风光，以及具有浓重地方色彩的农村集市盛况。在情节殊异的《圣约翰节前夜》、《五月的夜》、《圣诞节前夜》和《可怕的复仇》等作品里，虽然出现了魔鬼和妖精的形象，可是作者也赋予了它们某些现实性的特征，从而使读者几乎人鬼莫辨，真假难分，将其视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作品，一般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热情和主观想象；而果戈理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却有所不同，即使是运用怪诞的情节和象征性的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美学评价，其中仍然充满着酷似生活本身的描写。在这类作品中，不管是对民族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的歌颂，还是对格利茨柯和帕拉斯卡、伐库拉与奥克桑娜等男女青年们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揭露，对伤风败俗行为的嘲讽，无不显露出小俄罗斯人的民族特性和乌克兰的泥土气息。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而言，果戈理的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卓越的范例。

在果戈理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用来表现登场人物的每一个艺术细节，都不是自流的，它总是与人物的性格紧密相联，作为塑造典型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收集在《密尔格拉得》中的第一篇小说《旧式的地主》起，他就特别注意了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和环境的真实描写，集中笔墨，对“生活的主人”无情地进行揭露和批判；它们像聚光镜一样，让读者从中看清了沙俄农奴专制统治阶级腐朽衰败的情景和这个制度给俄罗斯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作品

展示出，老地主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普里合里亚·伊万诺夫娜所住的房屋矮小黑暗，院子里的花园杂乱冷落，房间里的摆设笨重古老，苍蝇在桌上“撒满了黑点”，举目所见，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环境既如此凋落衰败，生活其中的主人又是怎样的呢？果戈理以一系列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把两个旧式地主的寄生性和颓废的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普里合里亚·伊万诺夫娜的家政学是建筑在不断地开关储藏室，腌、晒、煮无数量的水果和蔬菜上面”。除此以外，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像照料小孩一样地照顾丈夫的衣食，甚至临终时的痛苦和嘱托也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最大的嗜好就是吃喝，太阳出山前便“已经坐在小桌后面喝咖啡了”。断断续续地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钟，一天不下十次。因为吃东西过多，晚上肚子胀痛得无法入睡，几次起床，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一边难受地发出呻吟，但妻子问他还吃点东西好不好时，他又大吃起来，而且吃完东西之后，他总是照例地说：“此刻仿佛轻快些了。”在妻子死后，他逐渐变得懵懵懂懂，完全丧失了生存的能力，酷似一具行尸走肉，不久就追随伊万诺夫娜也命归黄泉了——这一切，看来是那么平凡、琐碎和无聊，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入木三分的细腻之笔，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地主阶级无法挽救的没落趋势，看到了农奴专制和寄生虫生活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的可怕的灾难。这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沙俄来说，是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的社会现象，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但是，有人却指责作者没有通过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夫妇的形象，“阐明地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阶级的人们的一切倾向，以及激动着他们的一切”事物，没有在地主的周围，写出“勤劳的农村”和“倾家荡产的农民”。因而认为《旧式的地主》是一篇不真实的、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很显然，这种指责是欠公平和不应该的。须知，人们评价一部作品，只能根据其中已经写到的东西进行科学的分析，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侧面，有无社会进步意义，而决不能离开作家的创作构思，主观武断地规定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更不能要求作家像写哲学论文那样，将主人公所从属的阶级本性的“各个方面”揽括无遗。否则，势必导致文学评论的简单化，庸俗化，而对文学史的发展作出错误的估量，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产生恶劣的影响。

《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创作中一篇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有人以它为依据，断言果戈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认定他“估计现实是拙劣的，观察现实是不够客观的”，甚至说他的大部分作品是“杜撰的、病态的、腐烂的”，这显然是一种与事实完全相违背的结论。必须看到，在果戈理由浪漫主义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虽然能够找出一些与现实主义精确性和明晰性相背离的细节描写，但其中符合这种要求的细节描写不知道要超过它多少倍。而且从发展趋向来看，果戈理作品中细节描写的精确性与明晰性也是与日俱增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特别要有发展的观点，不能以偏概全，以支流代替主流，以前期否定后期，从而断言“果戈理绝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拿浪漫主义色彩甚浓的《塔拉斯·布尔巴》来说，同名主人公跟大儿子斗拳，目睹大儿子英勇牺牲，因失掉儿子静坐黑海之滨时的内心痛苦，和激战中亲手杀出出卖民族利益的二儿子以及他自己以身殉国等细节、场面的描写，都是俄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经典篇章。其形象之明晰，其心理之精深，其感情之强烈，其意境之优美，与世界第一

流的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如果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得》是小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生活的一个侧影，那么，《彼得堡故事》和《钦差大臣》就是京城和官场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到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果戈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细节和环境的描写技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死魂灵》（第一部）中，果戈理用来表现登场人物的每一个艺术细节，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和精细安排的。它们无不与人物性格紧密相联，而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手段。玛尼罗夫家客厅里绷着华丽绢绸和绷着麻袋布的靠椅并存；科罗皤契加家里椅壁上挂着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镜子背后塞满了破信札、旧纸牌和烂袜子；罗士特来夫家书斋里的墙壁上只挂着两支枪和一把剑；梭巴开维支家尽摆着一些笨重坚实的家具等细节描写，都像显微镜一样，让读者透过它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凡是读过《死魂灵》的人，恐怕谁也不会忘记乞乞科夫随身携带的那个极力不让别人了解其底细的箱子和他那身闪闪发光的越橘色燕尾服，以及由此而联想起的他那奸猾自负的性格特点。小说中关于泼留希金家的陈设，更是细节描写的范例，也是人物生活环境的传神之笔。一片破布，一把发黄的牙刷，一张破椅子的靠手，以及写过字的废纸，他都要收藏起来，同旧银器、中国磁瓶和上面结满蜘蛛网而已停摆的钟等物品，杂乱无章地一起堆满一屋子。透过这种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贪婪吝啬已渗入了泼留希金的每一个细胞，他的精神世界确已腐朽不堪，到了彻底毁灭的地步。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果戈理在描写同一生活现象的艺术细节时，也能精细地表现出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死魂灵》中五个地主对乞乞科夫的款待：在玛尼罗夫家，“只有菜汤，但是诚心诚意”；在科罗皤契加家，“有香菇，有烙饼，有蛋糕，有蒸饼，有酪条，有脆饼烘糕，以及各式各样的包子”；在罗士特来夫家，中饭的菜做得“有的太熟，有的还生”，但却有大量的葡萄酒、上等白酒、乌梅烧酒、“香槟和蒲尔戈浓”的混合酒，此外还有没有固定名称的“香醪”；在梭巴开维支家，是羊脊肋加粥，以及塞满着“各种好东西”的火鸡，而且分量很大；在泼留希金家，只有一个不堪入口的“复活节的饼干”，加上一瓶从中捞出了“蛆虫和苍蝇”的“果子酒”。果戈理通过地主们款待乞乞科夫的细节描写，便活生生地将玛尼罗夫的“甜腻腻”、科罗皤契加的善聚财、罗士特来夫的爱喝酒、梭巴开维支的贪口福、泼留希金的守财奴的性格特点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读后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还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性格物质化和物质性格化，是果戈理创作中细节描写的显著特色，日常生活环境的描绘，在他塑造典型人物的性格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非常注意描写人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揭示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精神世界跟沙俄农奴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曾经满腔热情地肯定：“果戈理的全部作品，专门致力于描写俄国生活，他在如实复制生活的这种本领上是无与匹敌的。”

二、辛辣的幽默讽刺

正如人类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喜剧性一样，喜剧性也贯串在果戈理全部创作的始终。而果戈理用以构成作品喜剧性效果的重要手段，则是辛辣的幽默讽刺。

果戈理创作中的喜剧性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幽默到讽刺，从善意的诙谐到毁灭性的嘲讽，这就是它发展的大致轮廓。果戈理早期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喜剧性特色是幽默，以及由幽默所引起的轻快、爽朗的笑声。不论是《索罗庆采市集》中对“胖美人”赫芙拉同亚芳纳西·伊凡诺维奇调情的描写，还是《圣诞节前夜》中对妖精勾引哥萨克男人的嬉笑，乃至《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中对希邦卡及其姨妈瓦西莎·卡施波罗夫娜精神世界畸形发展的揭示，作者对批评的现象和嘲笑的目标虽是怀着轻蔑与否定的态度，但在感情方面尚未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当时，果戈理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东西是社会生活中的“霉斑”，然而他又认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还是充满着生机的。因此，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总是以讴歌社会生活的健美的因素为主，而对畸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其目的仍旧是为了以丑衬托美，以恶衬托善，在以美战胜丑，善战胜恶的过程中，展示出生活的主导旋律，表白作者的是非观念、道德原则和对现实的态度。正是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支配下，果戈理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喜剧性现象的反映便渗透了乐天的幽默情调，而使读者发出爽朗轻快的笑声。

从《密尔格拉得》以后，特别是到了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果戈理作品中的喜剧性逐渐由轻快的幽默发展为辛辣的讽刺，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含泪的笑”，也就成了果戈理讽刺手法的独特风格。

果戈理的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是为被迫害、受侮辱的下层人民鸣不平的（如《狂人日记》、《外套》）。果戈理以他尖刻的讽刺笔墨揭露和控诉了官僚专制制度残酷践踏“小人物”的同时，也以喜剧性的细节描写剖示了“小人物”身上的弱点，唤起读者发出了含泪的笑声。这种嘲笑是对被官僚专制制度迫害致狂或致死的人而发的，表达了作者深沉而悲切的人道主义心境。

但是果戈理创作中的讽刺锋芒，主要是对准衰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沙俄官僚集团的。为什么这类作品也同样透过作者辛辣的讽刺，而表现出了“含泪的笑”的特色呢？

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心灵空虚，无聊已极，庸俗不堪。为了一支猎枪的事情而发生争吵，竟然引起一场无休止的诉讼，弄得双方倾家荡产，头发霜白，表露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半点人性的影子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你读到作品的末尾时，也会同作者一道发出悲痛的微笑和忧郁的叹息呢？因为它使你想到了生活，看到了生活的“病征历史”，于是，你便不能不啼笑皆非、摇头叹息，发出“这个世界上真烦闷啊”的呼叫。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邮政局长施别金、假钦差大臣赫列斯达可夫等，都是喜剧性的人物。但是，在这些“城市老爷们”统辖之下的百姓们的生活却是悲剧性的；他们平时被敲诈勒索和鞭挞蹂躏，“钦差大臣”来后虽苦苦申诉，可是无济于事，反而引火烧身，增加了许多新的灾难。正

由于作者把生活中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巧妙地展示了出来，所以在这里，“喜剧唤起的已经不是轻松的和愉快的、而是痛苦和悲哀的笑了”（别林斯基语）。由此可见，喜剧和悲剧不仅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美学范畴，同时也可以通过作家思想倾向的能动作用，使之发生转化，而达到辩证的统一。果戈理创作中由讽刺所引起的“含泪的笑”虽然属于喜剧的美学范畴，但它却又具有悲剧的因素。当它嘲笑的对象是普通人物时，它显得可笑而又可怜，喜剧和悲剧因素明显地同时并存。当它嘲笑的对象是“生活的主人”时，情况就要复杂些了：对“生活的主人”来说，他们的滑稽是可笑而又恐怖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喜剧，对他们的受害者来说，这种喜剧里又包含着悲剧的成分。按照传统的说法，喜剧的笑声一般是诱发嘲笑者的优越感，但果戈理创作中的“含泪的笑”却有所不同，它往往是一种自我嘲笑，或者是意识到自己被无情的力量所压倒而发出无可奈何的解嘲。所以“含泪的笑”的美学功能是介乎喜剧和悲剧之间的。它造成震动，使你对现实的丑恶和荒谬得到认识，产生反感，发出笑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喜剧所特有的矫正作用。正如梅叶朱琦夫斯基在《果戈理论》中所说，“作为艺术家的郭果尔（即果戈理——引者注），藉着笑之光，探寻着这种神秘的实体（丑恶）的本质；作为人的郭果尔，藉着笑之武器，与这个现实的存在战斗着。郭果尔的笑——那是人类与丑魔（丑恶）的斗争。”

如果说，“含泪的笑”是果戈理的讽刺的主要特色，那么，真实地再现现实则是他的讽刺的基本原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城乡的社会生活中，官僚地主发号施令，支配一切，俨然以“生活的主人”自居。但他们卑污自私，不讲公德，生活腐化，精神堕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果戈理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了可笑的素材，通过巧妙的艺术加工，把官吏、地主塑造成名不符实、表里背谬的讽刺形象。他们地位高贵而品德卑劣，权势无限而精神空虚，外表堂皇而内心丑恶，貌似优雅文明而实则鄙俗不堪……正由于这些矛盾现象的畸形共处，鲜明对照，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密尔格拉得地方法院的法官好酒贪杯，带头受贿，养尊处优，吃得又白又胖，但他却草菅人命，开庭办案时，不是打瞌睡，就是谈养画眉，呈文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就拿起笔来签字。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城镇的市长，因为制服上掉了一颗纽扣，命令村长们和市区管理员整整找了两年尚未罢休。地方的官员们如此昏庸腐朽，高级法院的官吏们也只不过是一丘之貉。乞乞科夫收买“死魂灵”的事情被揭发后，N省省会的官场风波四起，震惊不解，成了他们蹙眉搔首的难题；堂堂省府官员，对乞乞科夫这样明显的投机交易，尚且如此感到困惑，这便充分表露了沙俄官吏们的愚蠢无能、脱离现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权能殊异，名实不符，品位相违的矛盾，在这里形成了辛辣的讽刺力量。玛尼罗夫以人类文明和美德的楷模自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蠢类，梭巴开维支满心鄙视地将别人都看作骗子、恶棍和强盗，而他自己却正是他所鄙弃的那种人；泼留希金已完全淹没在极度贪婪吝啬的、卑劣渺小的感情之中，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感情行为的合理性……由于人物的主观感受与客观实际完全背离，在形象上形成鲜明而极不协调的对照，幽默和讽刺的艺术魅力便从中而生。

夸张是一切文艺形式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但在讽刺文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果戈理经常给人物性格中某一主要特征，作为人物心理和行为描写的基础，集中笔墨对它加以淋漓尽致的描绘，形成夸张的形象，来揭示

其隐藏的本质。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的吃喝，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的贪污，赫列斯达可夫的说谎，玛尼罗夫的幻想，罗士特来夫的吹牛，泼留希金的吝啬都是实例。

果戈理的夸张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一般不把形象夸张到怪诞的程度，而是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做贼心虚，当他听说赫列斯达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之后，他虽然作了周密的部署，可是内心仍然十分恐慌：本来是吩咐警察每人拿一把扫帚，将通向赫列斯达可夫所住旅馆的那条街打扫一下，结果竟说成了“每人拿一条街”当他动身到旅馆里去拜见赫列斯达可夫时，本来是取礼帽，却把帽盒当礼帽戴在头上；到旅馆里同赫列斯达可夫见面时，他“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伸直两手”，站在这位付不起房租饭钱，同样“睁大眼睛”的吃惊者的面前，而且按照既定的思维方式，从赫列斯达可夫说明自己困窘处境的真实言谈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进一步加深了他的错觉。之后，他更使尽了全身解数，低声下气，阿谀献媚，乘机拿出四百卢布当作两百卢布塞进赫列斯达可夫手里，还花言巧语地将这个“贵宾”邀请到自己的公馆做客，为女儿跟“钦差大臣”订婚创造了条件。事态的发展，确实是愈来愈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又是那样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而且越是深究细品，就越能显示出其对官场黑暗、社会恶习的深刻的讽刺力量。像这样的例子，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就更多了。比如玛尼罗夫和乞乞科夫在城里相遇时，“两个人互相拥抱”，足足“过了五分钟”，“互相接吻，很有劲，很热烈，至于后来门牙都痛了一整天”。……这些细节的描写，无疑是夸张的，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二者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运用描写对象的高尚语言和卑鄙目的，谈话时的严肃态度和谈话中所体现的无聊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及把一些互不相干的现象，任意地联系起来，造成逻辑上的异变和混乱，也是果戈理在他的创作中常用的讽刺手法。描写乞乞科夫同五个地主进行“死魂灵”的肮脏交易时，就基本上是采用这种手法。其中乞乞科夫跟玛尼罗夫夫妇告别时所谈的一番话和关于擤鼻涕擤得很响而“得到了侍者们的大尊敬”一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乞乞科夫是想用甜言蜜语讨好玛尼罗夫夫妇，然后从他们家里无偿地获得一批“死魂灵”。至于把鼻涕擤得很响，跟受到别人的尊敬，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正是通过这样两种互不相干的现象的凑合，却强调地指出了“这位绅士”的喜剧性特征，从而引起读者对他的鄙夷和憎恶。

此外，以生动而形象化的比喻，将否定人物的某种抽象感情或常见行为，使之物质化或动物化，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特异的情绪反应，情不自禁地发出幽默讽刺的笑声，这也是果戈理在自己的创作中，特别是《死魂灵》中运用得极其纯熟的讽刺手法。诸如将玛尼罗夫迎接乞乞科夫的笑脸比作“尽量地加了糟汁的药水”，把梭巴开维支的身材比作“中等大小的熊”，将“上流社会”那些穿着黑燕尾服参加知事家舞会的人比作一群“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把投机交易被揭发而身败名裂后的乞乞科夫比作见物必抓的“雄猫”，等等。作者藉助这些比喻，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正义立场以及对嘲讽对象的鄙弃感情和美学评价。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对果戈理创作的讽刺特色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小说，当你读的时候，是可笑的，当你读完之后，是悲哀的。他不是漫画式地、而是真实地表现着事物。”这完全可以作为果戈理讽刺艺术特点的结

论。

三、浮雕般的肖像描写

果戈理对人物形象外貌的描绘，绝无任何盲目性与随意性，而是在忠实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有其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因此，哪怕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几笔，也能把人物的相貌、神态，乃至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深深地刻印在读者的脑海中，使人们久久难以忘却。《外套》中的九品文官巴施马奇金在作品开始出现时，果戈理这样写道：“这个官员不能说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矮矮的身材，脸上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点近视，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颊布满了皱纹，灰黄的脸色使人疑心他患有痔疮”。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生理现象的描绘，巧夺天工地揭示了人物心理现象的社会基础，人们一看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地位卑微、备受压抑、生活困窘、饱经风霜的“小人物”。

果戈理的创作中，有大量的讽刺肖像素描。作者往往只是寥寥数笔，就能将讽刺对象卑微庸俗的性格特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伊凡·伊凡诺维奇与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写道：伊凡·伊凡诺维奇特别高瘦，他的头“很像一只尾巴朝下的萝卜”，他饭后爱吃甜瓜，并且总是要亲自动手切开，吃完时，用纸把瓜籽包好，写上“此瓜食于某日”、“某君在座”之类的字样；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非常矮胖，他则喜欢整天躺在台阶前晒太阳，洗澡时，在浴盆内放一张桌子，上置茶炊，躺在齐脖子水中喝茶。通过这些素描，外省地主那种生活腐朽、精神空虚的特性，就神形并茂，跃然纸上了。

果戈理在描绘人物的外貌时，从不浪费笔墨泛泛而写，总是准确地抓住人物外貌与人物性格内在联系的主要特征，集中地加以勾画，既使人物的外貌浮雕般地铭刻在读者的头脑里，又使其成为通向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请看果戈理是怎样描写泼留希金的外貌的：“乞乞科夫立刻发现了一个人样子，正在和车夫吵嘴。许多工夫，他还未决定这个人的性别，是男人还是女人。看看穿着的衣服，简直使人糊涂，这衣服很像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头上的帽子，却正如村妇所爱戴的。‘确是一个女人！’他想，然而立刻接下去道：‘不，不像女人！，……’“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来，……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藏着猫儿或顽皮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通过对泼留希金令人鄙夷的外貌的描写，特别通过他那双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的老鼠眼睛，那个总是被唾沫沾湿的下巴和那身脏得像抹布似的破衣服的描写，便把泼留希金那种贪婪吝啬的病态心理和地主阶级面临腐朽没落的凄凉命运揭示无遗。

四、个性化的语言

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给人们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还与他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密切相关。在果戈理的创作中，不管是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也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各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他们的语调、语气、语序和修辞，都是千差万别，独具一格的，三言两语就能揭示出人物性格特点，产生强烈的讽刺批判力量。

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已年近四十，姨妈为他找了个对象，并引他到邻村地主的家里和那位小姐去见面，以便建立感情，结成良缘。谁知两人相对而坐，形同木偶。希邦卡坐在靠背椅上如坐针毡，眼睛死盯着地板；那位小姐也是正襟危坐，面向窗户和墙壁。两人相对无言，足足静坐了刻把钟。然后，希邦卡满头大汗，鼓起勇气，带着颤音，好不容易才挤出这样一句话：“夏天苍蝇真多啊，小姐！”小姐也机械地回答道：“多极了，哥哥用妈妈的旧鞋子做了一个苍蝇拍，可是一点也没有用，还是多得很。”这就是希邦卡相亲时两方交谈的全部内容。人们读到这里，真会感到啼笑皆非。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生活把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歪曲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那么，这个社会在人们的脑海里，当然就只能唤起一种阴森恐怖的情绪，形象的暴露和批判力也就自然地由中而生。

伊凡·伊凡诺维奇即使给很熟悉的朋友敬烟时，他也要客气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请求，我的先生，赏点光吗？”假若不是熟人，那他便说：“我可以大胆地请求，我的先生，虽然我还没有荣幸知道您的官级、名字和父名，赏点光吗？”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不论给谁敬烟，总是打开烟盒，笔直地送到你的手里，说：“用点罢！”一听这些话，读者就不难觉察到前者文雅得令人作呕，后者粗鲁得叫人害怕，仅仅三言两语，便把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表现得如此鲜明，人的形象不觉呼之欲出了。

在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每个人物的语言都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色，并且具有极大的自我暴露的功能。例如，当市长因为赫列斯达可夫向自己的女儿求婚，自以为从此有了大靠山，而大做其当将军的黄粱美梦时，他首先得意洋洋，喜出望外地对妻子说：“真见鬼，中了头奖！”“他妈的，当将军真威风！有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说哪种绶带好，大红的还是湖色的？”接着又煞有介事、趾高气昂地对来向他拉夫系的同僚说：“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几句简朴的台词，就将市长那种愚蠢粗野，利欲熏心，骄横傲慢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

果戈理表现个性化语言的卓越技巧，在《死魂灵》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玛尼罗夫是一个多情而又易于伤感的人，所以他一说话就来就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言谈中充塞着虚饰的词藻，还常常流露出哀怨小说式的感伤情调，对任何问题都是一飘而过，浅尝辄止，有时甚至把一些不相关联的用词混杂起来。科罗皤契加的语言则是另一种风格，它总是沿着一条单线发展着，明显地表现出这位女地主愚昧迟钝、思想保守，眼光短浅、胸襟狭窄的性格特征。梭巴开维支的语言风格又与科罗皤契加完全相反，情绪的波浪起伏、语调的轻重快慢变化很大，由冷静到热烈、由争执到友善，常常在一次谈话中交替出现，把梭巴开维支的毫无道德标准的品性，绘声绘色地烘托了出来。罗士特来夫的语言特点是热烈的拍节结合着意义上的急剧停顿，尤其喜欢东拉西扯，其中常常夹杂着放荡儿和鲁莽汉的词汇，活现出一副地方恶

少式的流氓面孔。乞乞科夫见风使舵，看人说话，恰切地表现出了他那种圆滑奸诈的性格。

果戈理创作中的语言的个性化，还常常运用到一部作品的所有叙述单位，表现在某种特异情绪的音响中，那些情绪的音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局部的，但同时对整个作品的风格和结构来说，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外套》中，果戈理出自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叙述一个官员听到巴施马奇金哀求同僚们不要欺负他的感受时写道：“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学别人的样，也想取笑他，忽然竟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以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最快乐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的痛彻肺腑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并且在这些痛彻肺腑的话里面，可以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就用手掩住了脸，后来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多少薄情的东西……甚至在世人公认为高尚正直的人们中间，隐藏着多少凶残和租野的时候，他有许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这股扣人心弦的、悲伤的细流，冲进了充满喜剧气氛的叙述中，使整个小说的幽默呈现出新的色彩和新的意义，悲伤的音响也就随着变成了小说叙述的基调。

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雅俗共赏，老少欢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作者讲究使用个性化语言是密切相关的。

